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唐威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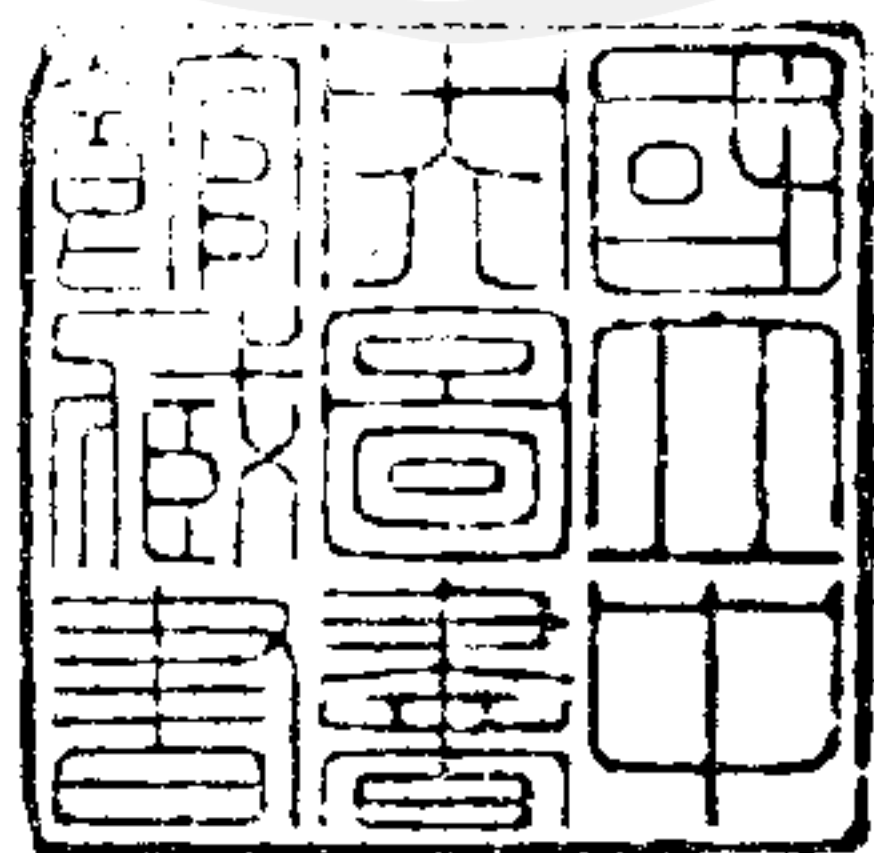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唐威譯



目次

譯者序	一
我們必須研究十月革命	一
「工農民主專政」——在二月和十月	九
反戰鬥爭和保衛主義	一五
四月會議	二〇
七月事變，哥尼洛夫叛亂，民主會議和預備國會	二五
十月革命前後	三一
十月暴動與蘇維埃「法統」	四三
再論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五五
關於本卷的簡單聲明	六二
附錄——三種俄國革命觀	六五

譯者序

此書，如著者所說的，本是一篇序文，冠於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托洛次基全集」某卷之上，爲了解釋一九一七年革命過程的，因爲這卷「全集」所收納的正是他在這一年當中的論文和演說。可是，——歷史上有前例麼？——一部書底序文，發表以後，竟成了一顆大炸彈，震動了整個國家，又以其餘波搖撼了全世界。一方面，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史大林，及其他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都演說和撰文攻擊托洛次基在此序文中的見解；他方面，若干其他領袖，尤其年輕一輩的人，則擁護這個見解。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在黨、政府和工會各方面佔據了支配地位，爲攻擊此序文而寫的文章或演說，他們把來彙爲一書，末附此序文，大量印刷，發交各級黨組織去討論。這便是發生於一九二四——二五年冬間的有名的「文字爭論」。當時托洛次基領導下的「左派反對派」已經形成了，但在此時以前所爭的僅限於爭取無產階級民主權利和黨內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化問題，到了此次「文字爭論」以後，則成爲兩種不同原則之間的鬥爭了。鬥爭發展下去造成了第四國際。第一次把鬥爭如此提高到原則平面上來的，正是托洛次基這篇序文。

現在，「托洛次基全集」久已絕版了，「文字爭論」也已成了歷史的陳跡，這篇做序文用的或作爲二十多年前爭論對象的「十月教訓」似乎沒有譯印必要了。然而不然。「十月教訓」，當初無論懷抱什麼目的來寫的，已經成了論述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字，而且是最好的文字，——除了托洛次基自

已後來寫的三大卷「俄國革命史」以外，至今沒有更好的文字關於十月革命的了。三大卷的「俄國革命史」，是以「十月教訓」為骨幹的，「十月教訓」不啻是「俄國革命史」底精華，抽去具體事實以後留存下來的革命法則或教訓，非常重要的教訓。托洛次基好以戰爭比擬革命，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十月教訓」乃是革命戰畧底最高課本，今後凡未曾鑽研這個課本的人將無能領導革命。我們正是把牠看作革命戰畧課本來讀牠，來譯成中文出版。我們希望牠能在中國第三次革命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但是一般說來，論述俄國革命的書對於中國革命有所裨益麼？中國革命將與俄國革命屬於同一類型的麼？將遵循同一發展法則的麼？這是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否則我們譯印此書就要變為全無意義了的。

現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流行的見解，都把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看做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都認為俄國革命教訓不適用於中國革命。抱持這種見解的人將會徵引本書來辯護他們的見解的，因為本書未曾有一處提起中國，而且明顯說出這「教訓」是爲了歐洲而寫的。「歐洲各國共產黨領袖若不以批評的和精細的研究去吸收十月教訓……」（見第四頁）

但這是一九二四年寫的話，那時中國尚沒有革命，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連托洛次基本人在內，尙未曾仔細考慮過中國革命問題。那時人們把十月教訓限制於歐洲範圍，是很容易瞭解的事情。

托洛次基此書寫成後八個半月，中國就爆發了五卅運動，即開始了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相反，這次中國革命很悲慘失敗了，本身供給了極可寶貴的教訓，雖然是失敗底教訓。研究中國革命而抽取其教訓，——這個工作做得最好的，不是別人，還是本書著者托洛次基自己。托洛次基從失敗

的中國革命抽取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便是：無論中國條件和俄國條件如何不同，中國革命則是與俄國革命屬於同一類型的，換一句話說，十月教訓也是能夠適用於中國的。

我們正是爲了第三次中國革命來譯印牠。在這序文底序文中，我們自然不能援引十月革命底教訓來討論中國革命所已遭遇的和所將遭遇的一切問題，但至少應當拿目前最重要的革命問題放在十月教訓光照之下考察一番的。

首先遇到的是關於革命性質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很明顯的。牠認爲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性質，但做革命動力的，除資產階級之外還有無產階級，這一點與西方先進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同，至於此革命中不能提出社會主義任務，須待此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點則是與西方先進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自稱這種革命觀是「列寧主義的」，即根據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見解。可是這話是誣蔑了列寧。布爾雪維克派底俄國革命觀，與門雪維克派底不同的，正在於布爾雪維克派明白指出：俄國資產階級沒有革命作用了，不僅不能做革命動力，而且是反革命因素了。凡認爲在帝國主義壓迫底下，中國資產階級能夠發揮革命作用的人，他就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拾門雪維克派底唾餘，因爲門雪維克派當初正是認爲在帝制壓迫底下，俄國資產階級能夠發揮革命作用呀。不幸這類門雪維克派革命觀做了中國第二次革命時代共產黨戰畧和策畧的根據，以此葬送了這次革命。

革命失敗以後和西安事變以前，中國共產黨，不錯，曾有一個時期否認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的作
用，而肯定惟有無產階級能領導中國革命。但這一點列寧主義的認識，後來又被拋棄了。現在的中國

共產黨，在理論上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能參加革命領導，在事實上則承認資產階級底完全的或大部份的領導權。共產黨代言人屢次聲明願在資產階級政治軍事領袖領導之下建設新中國，表示什麼呢，政治協商會議承認國民黨黨員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佔據半數，在行政院政務委員會中佔據三分之一，又表示什麼呢，倘若不是表示共產黨承認了國民黨底領導權？如果說這是列寧主義路線，那就是最惡毒地污辱列寧主義了。

可是，即使中國共產黨今後否認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即使牠退回到中國蘇維埃時代的認識去，但若仍舊堅持中國革命須分爲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須完成民主革命之後才能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那也不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列寧立場，而是以前的列寧立場，即列寧自己已經拋棄了的，送入「老布爾雪維克派古物陳列所」去的立場，亦即經過革命事變證明爲不可能的立場。現在則屬於史大林主義的立場。本書第二章，尤其本書底附錄，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前後不同的立場說得很清楚。總之，無論俄國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牠如果要成功，就必須推送無產階級走上政權，以無產階級專政去完成民主任務，但如此又必須提出社會主義任務，必須衝出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框殼，而使革命帶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性質。同俄國革命一樣，勝利的中國革命也是不斷發展的，也是不可分割的，無論以什麼開始都非發展至於社會主義不可的。就整個說來，中國革命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

「那麼至少革命一開始還不是社會主義的罷？」——有一派人反問我們。這派人如此留戀於史大林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以致雖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仍捨不得完全放棄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

性，至少要劃出革命底第一個段落稱之爲「資產階級民主」的。

我們並不否認革命一開始將主要地提出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但我們切不可因此忘記了：革命一開始就須以無產階級爲動力，革命一開始就須趨向於無產階級專政，於社會主義前途。托洛次基在他著的「一九〇五年」書中，分析了一八四八年德奧諸國革命經驗，徵引拉薩爾底話說道：「往後歐洲底任何鬥爭，若不一開始就宣佈爲純粹社會主義的，則沒有一次能夠成功；無論什麼鬥爭，在這中間，如果社會問題祇當作模糊的成分，且以次要的地位加入那鬥爭，再若那鬥爭從外表方面，在民族復興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底旗幟之下進行，則再也不能成功的了。……」拉薩爾主張「一開始就宣佈爲社會主義的」，並非因爲他認爲歐洲往後鬥爭一開始已無民主的任務了，而是因爲他認爲那鬥爭，一開始就須以無產階級爲動力，就須自覺地提出社會問題，就須向着社會主義前進。

拉薩爾分析了一八四八年德國大革命經驗之後祇說「歐洲往後鬥爭」，一九〇五年托洛次基分析了俄國第一次革命經驗之後，就把拉薩爾這個名言擴大應用於俄國革命了，一九二八年托洛次基分析中國第二次革命經驗之後又把這個名言擴大應用於中國革命了。從此以後，若不跟隨拉薩爾說道：往後中國革命，「若不一開始就宣佈爲純粹社會主義的，則沒有一次能夠成功，」——那就是中國革命底罪人了。凡堅持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性，或第一階段底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人，不過是以此爲藉口來施行史大林主義的政策，即低估無產階級動力和禁止於民主任務完成前提出社會主義任務罷了。

革命性質問題以外還有一類問題對於中國革命也是很重要的。爲了缺乏正確術語，我們勉強稱之爲革命路徑問題。自從上次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一種學說，認爲：中國革命有個特性，

越過黨頭上或拿別的東西代替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中國客觀條件已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但還缺少一個真正的羣衆的無產階級黨。造黨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在這序文裏，我們僅僅論及中國革命性質，路徑和黨問題，但並非說祇有這三個問題能適用十月教訓，也非說十月對於這三個問題祇有上述的教訓。上述的不過含有舉例的性質。中國革命如果發展去，能從十月學得教訓的還有許許多多。這就是我們譯印此書的動機。

此書譯成於一九四二年春，一直到今年都無機會出版。今年春，托洛次基遺著的「史大林傳」被禁四年多，終於得到發行允許了，其中附錄的「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對於革命性質問題的討論上將有很大的幫助，故特爲譯出作爲此書底附錄。如此將托洛次基與史大林主義鬥爭的第一篇系統的理論文字和末一篇系統的理論文字彙印爲一書，是有革命性質問題共同點聯繫着的。而此問題是中國革命目前爭論的中心問題。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譯者

力量做後盾，武裝鬥爭就是爲了造成這種武裝力量的。由此可見，革命成功雖然須得經過「聯合政府」，但武裝鬥爭仍是成功主因的。

武裝鬥爭這個「特性」雖然他國沒有，但「聯合政府」，則他國有的是，無論求之於過去歷史或現時事實，本書就可以告訴我們一九一七年間俄國「聯合政府」底經驗。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俄國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與那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組織「聯合政府」。布爾雪維克派便稱那兩黨爲「妥協派」，便說牠們參加「聯合政府」是爲了鞏固那業已動搖的資產階級政權。列寧此時正在著作「國家與革命」一書，用馬克思主義學說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混入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利用之爲革命服務的，必須根本打碎這個機構。列寧不僅反對妥協派與資產階級「聯合政府」而已，而且反對布爾雪維克右派主張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共存制。右派說：「立憲會議加蘇維埃，這便是我們所趨向的國家制度配合形態。」右派雖然沒有主張參加「聯合政府」，但這話正是出於「聯合政府」路線呀。如果沒有列寧領導的布爾雪維克派堅決反對「聯合政府」，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就註定非失敗不可了。

一九一七年以前，法國已經有幾次「聯合政府」經驗了，如戰前社會主義者彌爾朗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又如戰時馬克思主義者格德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一九一七年以後，社會主義者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更屈指難數。但結果都是替資產階級解決一些難題，解決之後就被資產階級一脚踢出去了。

現在，第二次大戰以後，「聯合政府」更充塞於歐洲諸國。幾乎各國都有社會黨和共產黨參加政府。但除紅軍直接支持的應當別論的以外，社會主義者在那些政府中，仍是替資產階級火中取栗的貓

爪。即以法國說，當「解放」時，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是瀕於瓦解的，但資產階級得社會主義者之助組織「聯合政府」至今，便把常備軍重新建立起來，警察和特務機構恢復戰前力量，起初佔第三黨位置的「人民共和運動」現在取得第一黨位置，不久之後，資產階級就要認爲這些社會主義者底協助是不需要的了。

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這裏，要反駁道：即使一九一七年俄國以及以前和現在歐洲諸國「聯合政府」路線是錯誤的（事實上他們並不認爲現在歐洲「聯合政府」路線是錯誤），但我們是在中國。中國是殖民地，不能與俄國和歐洲諸國相比。中國歷史又有這點「特性」，即：武裝鬥爭。何以見得中國不能實行「聯合政府」路線呢？

不錯，毛澤東底「聯合政府論」是以他的「新民主主義論」爲根據的，而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又是以中國殖民地地位爲根據的，「新民主主義論」說：「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祇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換一句話說：「新民主主義」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底特點，而「聯合政府」，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也祇能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行得通。可是戰後，共產黨理論家們常常超出這個限制以外，去援引歐洲諸國「聯合政府」經驗（他們認爲這些經驗是成功的）來替中國的「聯合政府」路線辯護，他們又指出這些國家實行的也是「新民主主義」，以顯得吾道不孤。如此一來，固然有了實例來增加立說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掘毀立說的根基了。「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可見不是出於中國特殊

性，也不是出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特殊性，而是史大林主義的一種國際通用的路線了。

那麼武裝鬥爭呢？至少武裝鬥爭是中國一種歷史特性罷？不然，不然。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祇有農民暴動，農民暴動的確是一開始就採取武裝鬥爭形式的。可是這不是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是凡農民暴動底通性，凡沒有西洋式城市，沒有自在而又自爲的資產階級活動的國家底通性。這種國家，雖經過革命而沒有出路，正是出於這個通性。謝謝上帝，中國現在已非這種國家了，中國現在已有西洋式城市，其中不僅有資產階級，而且有無產階級了。在「第一次革命」中，這些階級羽毛尚未豐滿，所以革命仍舊採取武裝鬥爭形式，而未會採取城市廣大羣衆運動形式，但正爲此故，這次革命才未完成其任務。在「第二次革命」中，我們看見了中國第一次有城市廣大羣衆運動，而且無產階級在這運動中佔據領導地位。中國第二次革命一開始並非採取武裝鬥爭形式，而是採取城市廣大羣衆運動形式，須待開始一年多以後才進行武裝鬥爭，而這武裝鬥爭乃是城市廣大羣衆運動所引起的。從第二次革命起，中國已經走上革命常軌了，已經沒有那種武裝鬥爭「特性」了。換一句話說：同其他國家一般，中國革命仍須以城市廣大羣衆運動爲主力的，否則革命便無成功希望的。中國革命走的仍是通常的路徑。如此，「十月教訓」也就能爲中國革命所應用了。我們應如何把最大的力量用在城市廣大羣衆運動上，尤其無產階級底鬥爭上；應如何放棄那依賴武裝力量來謀取資產階級的政府部長位置的路徑。

此書所說的革命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作用一點，對於現在中國也是很重要的教訓。在封建社會中，資產階級已操有財富，教育及與之有關的一切組織上利便處，雖需要革命黨，但沒有那般迫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則無產階級沒有那一切，牠祇能完全依靠黨來代替那一切。「沒有黨，離開黨，

越過黨頭上或拿別的東西代替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中國客觀條件已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但還缺少一個真正的羣衆的無產階級黨。造黨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在這序文裏，我們僅僅論及中國革命性質，路徑和黨問題，但並非說祇有這三個問題能適用十月教訓，也非說十月對於這三個問題祇有上述的教訓。上述的不過含有舉例的性質。中國革命如果發展去，能從十月學得教訓的還有許許多多。這就是我們譯印此書的動機。

此書譯成於一九四二年春，一直到今年都無機會出版。今年春，托洛次基遺著的「史大林傳」被禁四年多，終於得到發行允許了，其中附錄的「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對於革命性質問題的討論上將有很大的幫助，故特爲譯出作爲此書底附錄。如此將托洛次基與史大林主義鬥爭的第一篇系統的理論文字和末一篇系統的理论文字彙印爲一書，是有革命性質問題共同點聯繫着的。而此問題是中國革命目前爭論的中心問題。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譯者

十月教訓（註一）

我們必須研究十月革命

我們在十月革命之中得到成功，但是十月革命在我們的出版物之中是鬱鬱不得志的。直至現在，我們還沒有一本著作，描寫了十月暴動底全幅畫圖，而闡明其中政治上和組織上最重要的面目。不僅此哩，那些可供使用的原本材料，——連最重要的文件在內，——直接有關於革命準備上種種事態，或有關於革命本身的，至今尚未發表。關於十月以前的革命史和黨史，已經有無數的文件和材料發表了；我們也已經發表了好多材料和好多文件關於十月以後時期。但是十月本身受人注意則比較少得多。我們完成了十月革命之後，彷彿認為從此無須再做一次了。我們彷彿認為，研究十月，研究直接準備底實際條件，研究革命成就的真實經過，以及研究最初幾個星期間的鞏固革命工作，——這些對於未來建設工作底迫切任務是並無立即而直接補益的。

這種態度，即使僅存在於下意識中的，也是非常錯誤的；而且是狹隘的和民族主義的。

即算我們自己無須重覆十月革命經驗罷，但這絕不是說：這個經驗沒有什麼可供我們學習的。我們是「國際」底一部分；一切其他國家底工人又正待解決各自的「十月」問題。去年我們就有一件明白的事實，證明西方最前進的共產黨，不僅未曾吸收我們的十月經驗，而且連事實經過也不曉得哩。

自然，有人提出反對理由，總之：研究十月，或僅僅發表有關於十月的文件，都非提起舊爭論不可。但是這種態度，也是因噎廢食的。一九一七年的爭論固然是很深刻的，而且絕不是偶然的。但是現在，過了好多年之後，如果圖謀轉變這些爭論作為攻擊當時犯錯誤人的武器，那就是最可鄙的了。然而爲了微少的個人顧慮，而對於具有國際意義的十月革命最重要問題隱忍不言，那是更加不能容許的。

去年，我們在保加利亞遭受兩次大失敗（註二）。起初，爲了宿命論的和學究式的顧慮，黨放過了一個特別有利的革命行動機會（藏可夫六月政變以後農民暴動時候）。後來，黨爲了補救錯誤原故，竟於九月間沒有經過必要的政治上或組織上準備而實行暴動。保國革命本是德國革命（註三）一個先奏曲，不幸拙劣的保國先奏引入更加拙劣的德國大曲。去年末期，我們在德國看見了一件足爲典型的變事，表明了：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個十分特別的革命局勢是怎樣錯過了。然而，去年無論保國經驗或德國經驗，也未曾得到充分適宜而具體的估價。本文著者曾把去年德國事變之發展畫了一個輪廓（見小冊子「東方與西方」內「轉灣點」和「我們現時過的是什麼階段？」兩章）。此時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都部分地和全體地證驗了這個輪廓。此外沒有一個人曾經圖謀提出他種解釋，但是我們需要比輪廓更多的東西。關於去年德國底發展，我們必須有個充滿事實材料的具體論述。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論述，牠將供給一個具體的解釋，解釋此次最悲慘的歷史失敗是因何而起的。

然而，我們至今對於十月革命尚沒有一個政治上和策略上詳細的論述，要來分析保國和德國事變是很困難的。我們自己還未曾弄明白：我們成就了什麼，怎樣成就。十月之後，在勝利熱潮之中，好

像歐洲事變可以自己發展的，而且可以在很短期間發展，來不及在理論上吸收十月底教訓。但是事實證明了，若無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則革命本身就成爲不可能的。無產階級不能以自發的暴動奪取政權。即使工業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德國，工人自發的暴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也祇能轉移政權於資產階級之手。這個有財產的階級能夠從那個有財產階級手裏奪得政權，因爲牠有牠的財富，牠的文化，以及牠與舊國家機關無量數的聯繫爲其基礎。但是無產階級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自己的黨。直至一九二一年中，正式建立各國共產黨之工作，方才真正開始哩（在「征取羣衆」「聯合戰線」等口號之下）。十月問題退到旁邊去了，同時十月之研究也擱置起來了。去年我們又才面對着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現在正是我們搜集一切文件，印行一切可供使用的材料，而用心去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我們自然知道，每個民族，每個階級，甚至每個政黨，首先是從自己的經驗底嚴重打擊之下去學習的。但這絕不是說，他民族，他階級或他政黨底經驗是更少重要些。我們若是未曾研究過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經驗，我們仍是不能完成十月革命的。總之，我們是立足於過去諸次革命教訓之上，展長其歷史路線，而經過一九〇五年我們自己「民族的」經驗的。以後在整個反革命時期中，我們都在學習着一九〇五年底教訓而從中做出結論。對於業已勝利了的一九一七年革命，我們却未曾做過這個工作，連其中十分之一也未做過。不錯，我們現在並非生活在反動時代。也未曾被人家流放。但他方面，能受我們調動的力量和資源也是那幾個艱苦年頭所不能比擬的，我們必需做的事情，全在於簡單而明瞭地提出研究十月革命任務，——在黨內提出，以

及在整個「國際」範圍內提出。整個的黨，尤其是年輕的幾輩人，都必須研究和漸漸吸收十月底經驗，這個經驗給了我們以最高的，最可靠的手段去考驗過去，而開啓大門通到未來去。去年德國底教訓，不僅切實提醒了我們哩，而且給予我們一個嚴重的警告。

無疑，有人會反駁我們，說：即使非常透澈研究了十月革命過程，也不能保證我們的德國黨定會勝利的。但這種籠統的庸俗的推論方法，並無益於我們。自然，僅僅研究十月革命是不足保證他國革命勝利的；但是會發生這樣一種局勢：革命底一切前提都具備了，除了一個有遠見的堅決的黨領導機關，牠能明白革命底規律和方法。去年德國就是這個局勢。其他國家也會發生類此的局勢。但是要研究無產階級底革命規律和方法，則自今以前再沒有比十月革命經驗更加重要而深刻的了。歐洲各國共產黨諸領袖，若不以批評的和精細的研究去吸收十月教訓，那就好像一個軍隊總司令，他在近代條件之下準備新的戰爭，却不去研究上次帝國主義戰爭在戰畧上，策畧上和技術上的經驗。這樣一個總司令將來必然要把他的軍隊引到失敗去的。

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工具就是黨。根據我們的經驗（僅僅拿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來說）以及芬匈意保德諸國補充的經驗來說，我們就可以提出一條顛撲不破的規律，說：從革命底準備活動到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在這過渡中間，黨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說來，黨底行程上每到嚴重的轉變點，都要發生黨內危機的，或者發生於轉變以前，或者發生於轉變以後。要解釋這個，可以借助於下面事實，即是：黨底發展每個時期都有其特別的徵象，因之都有其特別的習慣和特別的工作方法。策畧上轉變，或多或少必然要打破這些習慣和這些方法。黨內摩擦和危機，其直接的和最切近的

根源就在這裏。一九一七年七月列寧寫道：「這種事情太常見了，即是每逢歷史突然轉變時，甚至最前進的黨，也有或長或短一個時候，不能適應於新的條件。牠們祇曉得重覆昨日的口號，——這些口號昨日是對的，今日則爲了歷史「突然」轉變之故，而「突然」喪失其一切意義了。」（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十二頁）（註四）由此就發生了危險，即是：倘若這個轉灣太過劇烈了或太過突然了，倘若以前時期黨底領導機關積蓄了太多的惰性元素和保守精神，那麼在此重要而危急的時機，黨便不能實行領導作用了，——幾年或幾十年以來，黨本是準備着領導這個時機的。黨於是受了危機所損害，運動離開了黨而進行，沿着失敗道路走去。

一個革命黨是要感受其他政治勢力壓迫的。在其發展上每一階段，黨都要製定自己的手段來對抗和抵制這個壓力。當策略上轉變及因之而起的內部派別變化和磨擦期中，黨底抵抗力減弱了。因此，黨內派別變化本是由於策略轉變需要發生的，却往往發展出於原來爭論點之外，而支持各種階級傾向。更明白地說：黨若不能與本階級歷史任務步驟一致，就要變成其他階級底間接工具，或有變成此工具之危險。

我們以上說的話，用於策略上最嚴重的轉變若是正確的，那麼用於戰畧上的大轉變更加是正確的了。我們在政治學上借用了軍事名詞：所謂「策略」乃是指領導個別的運動而言，所謂「戰畧」乃指奪取政權而言（註五）。大戰以前，我們一般未曾作此區別。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則祇限於社會民主黨底策略觀念裏面。這也不是偶然的。社會民主黨實行議會策略，工會策略，市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資源——一切隊伍——以戰勝敵人，這個問題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確是

未曾提出來的，因為那個時期，關於奪取政權的實際任務並未曾提出來。一九〇五年革命，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才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鬥爭底根本問題或戰畧問題。爲此之故，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雪維克派，才佔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戰畧底大時代開始於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國，後來普遍於其餘的歐洲。戰畧自然不排斥策畧。工會運動，議會活動等等問題，自然不會消滅的；但是這些問題現在得到了新的意義，成爲配合的政權鬥爭中一些附屬的手段。策畧是附屬於戰畧的。

策畧上的轉變既然常常引起了黨內磨擦，那麼因戰畧上的轉變而起的磨擦自然更深刻得多和劇烈得多了！一切轉變中最劇烈的，還是：無產階級從準備和宣傳，組織和鼓動等工作，轉變到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到反對資產階級的武裝暴動去。黨內剩餘的猶豫，懷疑，妥協，屈服等成分，即剩餘的門雪維克成分，此時都要浮到表面上來，爲的反對暴動，而且提出理論公式以辯護這個反對，而這些公式在昨日的敵派機會主義者武庫之中是有現成可用的。以後我們將有機會不止一次看到這個現象。

決勝負鬥爭前，黨底武器底審查和選擇是行於二月至十月之間的，那時有羣象中最廣大可能的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可爲依據。在十月中間和十月以後，這些武器又在偉大的歷史行動火燄中鍛鍊過。現在，十月革命好多年後，還要從種種不同的觀點去估計一般的革命和特殊的俄國革命，而避免一九一七年經驗，——那完全是玩弄無益的煩瑣哲學。那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那無異乎爭論種種游泳法底利弊，而不肯看看水裏游泳者實行這些方法時候的成績。各種革命觀點底最好的證驗，莫過於觀察這些觀點在革命之中如何實行了，正如一種游泳法底好壞，當游泳者跳入水內之時最能證驗出來的。

(註一) **十月教訓** 著於一九二四年，本是一篇長序冠於托洛次基全集中名爲一九一七年的兩卷書上面的；這二卷書搜集了托洛次基在一九一七年寫的論文，擬的文件和作的演說，恰於那時出版。一九二四年之於俄國革命，不啻一七九四年之於法國革命！這年開始列寧就死了；列寧病中和死後是所謂「三頭」執政：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和史大林，真實權力則漸漸操在史大林一人手裏。到了這年秋季，「三頭」便利用托洛次基發表這篇長序的機會，掀起一個「反托洛次基運動」，而史大林也於此時斬斷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傳統，提出他有名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了。蘇聯共產黨內這次理論爭論造成了反對派運動，這運動從蘇聯蔓延於世界各國，引起共產黨分裂，結果至於成立第四國際。這個大運動有其物質基礎，但在文字形式上說則是從托洛次基這篇長序「十月教訓」引出來的。所以「十月教訓」不僅是指導我們去學習「十月」的一個卓越的著作而已，牠本身也爲十月後一個歷史上大運動底基本文件。

(註二) **保加利亞一九二三年革命** 當時保加利亞是農民黨領袖史坦布里斯基組閣，六月間藏可夫領導的反動派起來武裝暴動推翻政府，但是接着農民暴動起來，擁護着政府與反動派作戰。那時保加利亞共產黨在這鬥爭之中竟宣布中立，坐視農民被反動派擊敗了的。到了九月間，共產黨自己受反動派壓迫了，才匆忙起來暴動。結果自然失敗。

(註三) **德國一九二三年革命** 這年一月，法國因爲德國停付若干賠款，遂出兵佔領德國工業區魯爾，以此觸發德國社會危機。德國共產黨勢力強大起來，本能征取羣衆多數而取

得政權，但因領袖遲疑，不敢採取堅決行動原故，資產階級遂先發制人，給革命勢力以打擊，然後借美國資本主義援助，將局勢穩定下來了。革命時領導者底錯誤和革命後第三國際討論時未能得出真實的教訓，更加使托洛次基覺得有寫這長序之必要。

(註四) **關於列寧全集頁數** 按本書凡徵引列寧言論而註明出於全集某卷某頁之處，皆指全集俄文第一版頁數。

(註五) **戰畧和策畧** 按 Strategy 和 Tactic 二字本係軍事學上名詞，中文軍事學舊譯 Strategy 爲「策畧」，Tactic 爲「戰術」，想係借用日本譯法的。但中文關於政治的文章不知何時將 Tactic 譯爲「策畧」了，到十月革命之後碰着 Strategy 遂無適當的字可譯，起初有人譯爲「戰術」的，但這顯然是輕重倒置，惹起紛亂，懂得軍事學的人尤其要發生誤會。近年 Strategy 譯爲「戰畧」已經是普遍而確定的，但與軍事學譯名仍不一致。不知中文軍事學名詞亦能遷就這政治文章的通用譯名否？

「工農民主專政」——在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底過程和結局，給了那種煩瑣哲學式的馬克思主義幻想以一個無情的打擊；這個幻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勞動解放社」（註一）已有一部分抱此幻想，而其最完全的表現則在門雪維克學說裏面。這個偽馬克思主義底本質，乃在於：將馬克思說的「工業上較多發展的國家僅僅顯示工業上較少發展的國家，以後者未來的形態」這句有條件性的和有限制意義的話轉變為一條絕對的和（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超歷史的法則；以及圖謀在這條法則之上建立無產階級黨底策畧。如此形成起來的理論，自然，在較多發展的國家未有「先例」可援以前，不會提起俄國無產階級方面奪取政權鬥爭的。不錯，每個落後國家都可以在前進國家歷史中發現其未來形態若干特性，但是整個發展底重演是完全談不上的。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經濟愈加帶着國際性，則落後國家底發展就愈加現出特異的情況，——這些落後國家必須把自己的落後原素同資本主義發展底最近成績配合起來。恩格斯在農民戰爭序言中寫道：「到了某個階段資產階級就開始覺知那與牠同行的無產階級已經走到牠前面去了，——這個階段並不一定處處同時發生的，也不一定發生於同一發展水平上。」歷史發展進程使得俄國資產階級比其他一切國家資產階級更早些也更完全些覺知了這個情況，列寧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就已經拿「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公式來表明俄國革命底特殊性了。如往後發展所證明的，這個公式本身，僅僅當牠是走向（受農民擁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去的一個階段，才有意義可

言。但是列寧如此提出問題，完全含有革命的和動力的意義；他是完全地和不妥協地拿這個公式去抵制門雪維克公式的，——據門雪維克說，俄國只能覆演先進國底歷史，由資產階級操持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居於反對黨地位。然而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在列寧這個公式中並不着重於專政，反而着重於民主性，以之同社會主義性對立起來。如此一來，這個公式祇能表示：在落後的俄國，惟有民主革命才是可以思議的了。社會主義革命祇能開始於西方，而我們也祇能追隨英，法，德諸國之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如此提出問題，必然要流入門雪維克主義的；這一點在一九一七年就完全顯露出來了，那時革命任務提到我們面前的，不是爲了診斷，而是爲了決勝負的行動。

在實際的革命條件底下，若是採取擁護民主立場，推行民主至其邏輯的結論，而把社會主義當作「未成熟」來反對，——則政治上必然要拋棄無產階級立場而採取一種小資產階級立場，即是採取民族革命左翼立場。

二月革命，就其本身來看，乃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但是當作資產階級革命說，牠來得太遲了，牠失去任何穩定的可能性了。內部矛盾直接表現爲雙權政制；受了這些矛盾所撕裂，此次革命祇有兩條道路可走：或者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前奏曲（事實上走的是這條路），或者使得俄國墮落爲半殖民地國家，由一種資產階級寡頭政制來統治着。因此，二月革命以後那個時期，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的：或者看做「民主」革命鞏固，發展或完成之時期，或者看做無產階級革命準備時期。不僅僅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站在第一種觀點上哩，我們黨內上層也有一部分人站在這個觀點。所不同的就在於我們黨內這部分人是真正努力把民主革命儘量向左推的。但用的方法本質是一個樣的，

即都是要向那站在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施行壓力」，而此「壓力」又不超出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範圍以外。這個政策如果佔優勢了，革命底發展，就要超越我們的黨底頭上，結果工農羣衆將自己暴動起來，不受我們的黨底領導；換一句話說，我們要大規模覆演七月事變，那時將不是革命中一個插話，而是革命底大失敗了。

十分明白，這個大失敗底直接後果，就是我們的黨底肉體毀滅。如此可以明白，當時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如何深刻了。

革命初期，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底影響，自然不是偶然的。這個影響反映了人口中小資產階級羣衆主要是農民——底優勢，以及革命本身底未成熟狀態。在那因戰爭而起的非常特殊的狀況當中，正是這個未成熟狀態致使領導權或貌似領導權落入於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手裏，結果使得他們去擁護資產階級應享政權的那個歷史權利。但這絕不是說，俄國革命非走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道路，便無其他道路可走。那條道路不僅是從階級關係上生出來的，而且是從戰爭造成的臨時景況中生出來的。爲了戰爭原故，幾百萬農民組織爲軍隊，武裝起來。無產階級未能在自己旗幟底下組織起來，又在未能領導農村羣衆之前，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便自然而然地獲得了反對戰爭的農民軍隊底支持。這幾百萬人軍隊足以直接支配一切，靠着他們的重量，那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便向工人施行壓力，在第一時期中拉着工人走。但在同一階級關係之上，革命仍可走上不同道路的，大戰臨發生前的事變最足以證明這個。一九一四年七月，彼得格拉瀾漫着革命的罷工潮。事情發展至於街道公開戰鬥程度。運動底絕對領導權是操在我們的黨底秘密組織和公開刊物手裏的。布爾雪維克主義，與取消主義及一

般小資產階級黨派作過直接的鬥爭，在此鬥爭中增加牠的影響。那個運動若是繼續發展下去，首先就是表示布爾雪維克黨之增長。那個運動若是走到了蘇維埃階段，則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半是自始就屬於布爾雪維克派的。農村底覺醒亦將在布爾雪維克派的城市蘇維埃直接或間接領導之下進行。這並不一定說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會立刻從農村消失了。不。農民革命底第一階段多半要在民粹派旗幟之下進行的。但是事變若能照我們預測的發展下去，則民粹派自己也將不得不把其中左翼推上前來，爲了與布爾雪維克派的城市蘇維埃締結同盟。自然，即使在這個情形之下，暴動底直接結果也是首先依賴於軍隊情緒和行爲的，軍隊與農民有密切聯繫。倘無大戰爆發，在發展練條之上鑄下一個大的新環，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運動能獲得勝利麼？——這一點，現在是不能猜測的，且無猜測必要。但有不少的證據足以證明：如果依照一九一四年七月事變開始的道路發展下去獲得革命勝利，則推翻帝制後多半是革命的工人蘇維埃立即拿到政權的，而蘇維埃經過民粹派左翼媒介（一開始！）又將吸引農民羣衆走上蘇維埃道路。

戰爭中斷了這個在開展中的革命運動。戰爭起初延緩這個運動，但以後就大大促進這個運動了。經過幾百萬人的大軍，戰爭替小資產階級黨派造成了一種絕對特殊的基礎，無論在社會方面說，或在組織方面說。因爲農民底特性恰在於：農民雖然人數衆多，但很難組織起來，即使具有革命精神也是難於組織的。小資產階級黨派現在既然有了現成的組織即軍隊可爲依據了，於是凌迫無產階級，並使之迷困於保衛主義之中。爲此原故，列寧才氣憤憤地立刻起來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舊口號的，——這個口號在新局勢之下不過表示布爾雪維克黨鬥爭，於政權問題明顯提出的直接革命時期，必然要呈

現爲最明白，最公開，最赤裸的形式。

X

X

X

奪取政權的問題，直至四月四日，即列寧回到彼得格拉之後，才提出於本黨面前。但甚至那時以後，黨底政治路線也不是統一而不可分的。雖有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底決議，黨內反對革命路線的傾向（有時是隱蔽的，有時是公開的）依然貫徹於整個準備時期。關於二月革命開始至十月革命鞏固之間，黨內爭論經過之研究，不僅有異常的理論意義，而且有異常的實踐意義。一九一〇年，列寧說過一九〇三年第二次黨大會之爭論具有一種「預先警告」的性質。若能追溯黨內爭論至一九〇三年，或更早些，從「經濟主義」研究起，那是很好的。但是這樣一種研究，若不發揮至其邏輯的結論，若不包括那試鍊此爭論的十月時代在內，便沒有意義。

在這篇序文範圍內，我們自然不能徹底研究這個鬥爭底一切階段。但我們認爲我們的文獻之中關於本黨發展最重要時期這個可惋惜的空白至少必須填滿一部分的。

上面已經說過，爭論要點集中於政權問題。一般說來，這是一個試金石，足以決定革命黨（以及其他黨派）底性質的。

這個時代提出來和決定過的戰爭問題，亦與政權問題有密切關聯。我們打算依時間先後討論這些問題，而以下列諸事件爲時期分界點：帝制推翻後和列寧回國前第一時期中黨和黨報底立場；列寧提綱引起的爭論；四月會議；七月事變以後；哥尼洛夫叛亂；民主會議和預備國會；武裝暴動和奪取政權問題（九月和十月）；「清一色」社會主義政府問題。

我們相信，研究了這些爭論之後，我們就可以替共產國際其他各黨做出頗為重要的結論了。

(註一)「勞動解放社」 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一八九三年組織於瑞士，領袖是普

列漢諾夫，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後始解散。



反戰鬥爭和保衛主義（註一）

一九一七年二月之推翻帝制，自然是向前大跳一步。但如果我們祇在二月界限以內來看二月，即如果我們不將二月看做向十月前進一步，那麼二月不過是表示俄國漸近於資產階級共和國——如法國——形態而已。小資產階級革命黨派一向將二月革命，既不看做資產階級革命，又不看做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一步，而看做一種自足的「民主」整體。他們於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立下革命的保衛主義底觀念系統。據說，他們保衛的，並非某一階級底統治，而是「革命」和「民主」。但甚至在我們自己黨內，二月底革命動力初時也是把政治遠景弄得異常紛亂的。事實上，三月間真理報採取的立場是多接近於革命的保衛主義，而少接近於列寧立場的。

我們在真理報某篇社論中看到了如下的話：「當這個軍隊同那個軍隊對立作戰時候，若叫這個軍隊放下武器撤退回來，那是最荒謬不過的。這種政策並不是和平政策，而是奴服政策，必為自由民衆所鄙棄的。不，民衆要不畏一切留在自己崗位上，以槍彈還槍彈，以砲彈還砲彈，這是不容置疑的。我們一定不容許任何事情足以瓦解革命軍隊的。」（真理報，第九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不要秘密外交文中）這裏，我們沒有看見說起階級，說起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反之，這裏說起了「自由民衆」。並沒有階級間為政權而鬥爭，而祇有自由民衆「留在自己崗位上」。思想和公式二者都徹頭徹尾是保衛主義的！同一篇論文以後又說：「我們的口號並非空洞叫喊『打倒戰爭！』——這個口號意

即瓦解革命軍隊，瓦解那愈來愈加革命的軍隊。我們的口號乃是向臨時政府施行壓力（！），迫着牠決然而公開在民主的世界（！）面前努力（！）去說服一切交戰國立即進行談判以終止世界戰爭。未到那時以前，每個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崗位（！）。」向帝國主義政府施行壓力，迫牠走上一條善良的道路，——這個政綱乃是德國考茨基和列德布，法國約翰·朗格，英國麥克唐納等人底政綱，但絕不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政綱。做結論時，這篇論文不僅「最熱烈地」向彼得格拉蘇維埃那篇有名的可鄙的告世界民衆書（從頭到尾都沾染革命的保衛主義精神）「致敬」哩，而且代表編輯部「很高興地」歡迎彼得格拉兩個會議通過的公然保衛主義的議決案。關於這些議決案，我們祇消摘錄一段就夠了，即是：「德奧二國民主派如果不肯留心聽我們的（即臨時政府和妥協派蘇維埃底，——托註）呼聲，那麼我們就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至於最後一滴血。」（真理報，第九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上面徵引的那篇論文，並非例外。恰恰相反，那篇論文正是準確表示列寧回國前真理報底立場。譬如下期，在論戰爭一篇文章中，雖然相當批評了告世界民衆書，却仍說出如下的話：「我們不能不歡迎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昨日發出的告世界民衆書，那是號召世界民衆起來脅迫各自的政府去終止大屠殺的。」（真理報，第十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我們當從何處找尋戰爭底出路呢？這篇文章回答道：「出路乃在於向臨時政府施行壓力，要求政府宣布牠已準備立刻開始媾和談判。」（同上）

我們還可徵引好多這類的文字，根本屬於保衛主義性質和妥協主義性質的。正當這個時期，或比此時更早一星期，還留在沮列希狹籠內的列寧，已經在他的遠方來信（其中多數未曾寄到真理報）中

大發雷霆，反對一切向保衛主義和妥協主義讓步的微小示意了。三月八日，他在資產階級報紙訪電底曲面鏡中辨認革命事實真像時候，就寫道：「絕不容許我們將這個事實對自己和對民衆隱瞞起來，即是：這個政府仍要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牠是英國資本主義底代辦人，牠要恢復帝制，要加強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無產階級革命第七期，第二九九頁）以後，三月十二日，他又說：「向這樣的政府建議媾和，無異乎向老鴉宣傳貞節。」（同上第二四三頁）正當真理報主編向臨時政府「施行壓力」，迫牠「在民主世界面前」爲和平而努力的時候，列寧寫道：「要求願去可夫和密留可夫政府迅速締結一個光榮的民主的和慈惠的和約，這無異乎一位鄉村老教士要求地主和商人過着敬虔的生活，愛鄰如己，左頰被打還要吧右頰送上去。」（同上第二四四頁）

四月四日，回到彼得格拉第二天，列寧便毅然決然起來反對真理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立場。他寫道：「我們絲毫不贊助臨時政府！我們必須暴露其一切許諾都是完全騙人的，那句不割地的話尤其其是騙人的。必須來一個暴露，以代替這個不可容許的「要求」，即要求這個政府，這個資本家政府，應停止其爲帝國主義的。這個要求祇能傳播幻想罷了。」（全集第十四卷第一部第十八頁）妥協派三月十四日發表的告世界民衆書，如此受着真理報恭維的，不用說要被列寧稱爲「可鄙的」和「糊塗的」。正當自己同本國銀行家成立合作政府時候，要號召其他國家的民衆起來同各自的銀行家決裂，——那是虛僞到頂點了。列寧在一篇政綱草案中寫道：「那些「中派」時時刻刻宣誓和賭咒，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助和平，主張向政府施行「壓力」，「要求」政府「表示民衆要求和平的意志」。」（同上第五十二頁）

但是這裏一定有人要反駁我們，說：一個革命黨可以拒絕向本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施行壓力」麼？自然不可以拒絕的。向資產階級施行壓力，乃是改良底道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排斥改良。但是改良道路僅僅在輔助問題上才有用，在根本問題上則沒有用。國家政權不能從改良道路得來。「壓力」絕不會迫得資產階級在一個與其整個命運有關的問題上改變牠的政策。戰爭造成了革命局勢，正因為戰爭不能替改良主義的「壓力」留下餘地了。此時祇有兩條道路可供抉擇：不是完全跟着資產階級走，便是鼓起羣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從牠手裏取得政權。在第一條道路上，祇要肯去無條件贊助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外交政策，還可以取得內政上某種改良。正爲這個原故，社會改良主義，到了戰爭爆發時候，就公開轉變爲社會帝國主義了。亦正爲這個原故，真正的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發起這個新的國際。

真理報底觀點，不是無產階級的和革命的，而是社會民主黨的保衛主義的，雖然牠的保衛主義還在動搖不定。牠說：我們已經推翻俄國帝制了，現在我們就要向自己的民主政府施行壓力了；政府必須向世界民衆提議媾和；德國民主派若是不能壓迫他們自己政府來媾和，那麼我們就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至於最後一滴血。和平前途未曾提出作爲勞動階級底一個獨立任務，作爲工人必須越過臨時政府頭上去履行的任務；因爲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會提出作爲實踐的革命任務。然而這二個任務是互相糾纏不可分離的。

(註一) **保衛主義** 即保護祖國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第二國際屬下德，法，比，

英，各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門雪維克派，都拋棄了國際主義而藉口種種理由宣佈保護各自的祖國，與「敵國」作戰。這些社會主義黨根本上是本國資產階級尾巴而已，不能領導無產階級走上革命道路的。列寧領導下的布爾雪維克左派反對「保護祖國」，托洛次基亦然。各國社會黨中雖也有人反對「保衛祖國」的，但人數很少，將來構成第三國際底核心，在當時則未能起積極作用的。這裏說的「革命的保衛主義」，與一般的保衛主義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即都是與本國資產階級合作的，但合作藉口則不一樣。二月革命之後，原來保護祖國的，自然主張繼續戰爭，原來反對戰爭的，如列寧回國前的布爾雪維克派，現在也主張繼續戰爭「直至最後一滴血了，」因為他們說：現在保護的是「革命」，是「民主」。

(註二) **失敗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提出失敗主義以對抗第二國際各黨底保護祖國政策。正如保衛主義是以階級合作為基礎一樣，失敗主義乃是階級鬥爭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結論。列寧說過，「本國戰敗禍害較少」。他所謂本國戰敗，不是同敵國勝利相對比的，而是同革命勝利相對比的。

四月會議

列寧在芬蘭車站所作論俄國革命底社會主義性的演說，對於黨內許多領袖不啻是一顆炸彈。列寧和那些主張「完成民主革命」的人中間的爭論，從第一天就開始了。

四月的武裝示威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爲了此次示威，黨內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件事情使得某些右派代表有所藉口，控告列寧犯着白朗基主義錯誤。蘇維埃大多數那時是擁護臨時政府的，照他們說，要推翻臨時政府就必須違反勞動者大多數意志。從形式觀點看，這個控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事實上，列寧底四月政策之中毫無一點白朗基主義影子。在列寧看來，整個問題乃在於探究：蘇維埃是否還在反映着羣衆底真實情緒，黨跟着蘇維埃大多數背後跑是否犯了錯誤。四月示威走得比原來計劃的「左得多」了；這個事件其實是一種斥候戰，爲了探測羣衆情緒及羣衆與蘇維埃多數間的相互關係。這個斥候戰結果，告訴我們：必須長期準備。我們看見，列寧在五月初盡力約束克龍斯達脫的人，因爲他們走得太遠了，他們宣佈反對承認臨時政府。……但是那些反對爲政權而鬥爭的人，對此問題的態度完全不同。在四月黨會議上，卡明尼夫同志有如下的言論：

「在真理報第十九期上，某些同志（顯然指列寧說的——托註）提出一個議決案，大意說我們要推翻臨時政府。這個議決案在上次危機前就印出來了，後來這個口號就被人拋棄，被人視爲有瓦解作用的，又被人視爲冒險主義的。這就是說我們的同志在上次危機之中學習了一點東西。現在提出的議

決案（按即列寧向黨會議提出的議決案——托註）又犯了這個錯誤。……」

如此提出問題很值得我們注意。列寧由於探測得來的經驗，撤回了立即推翻臨時政府口號。但他並非於一段時間之中——幾星期或幾個月——撤回這口號的，他是完全根據羣衆對於妥協派的反抗或速或緩來決定應否提出這口號。反對派則相反，他們認爲這口號本身是錯誤的。列寧底暫時退守絕不含有改變政治路線之意。他並非以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爲根據的。他完全依靠在這個觀念上面，即說：羣衆目前尚無能力推翻臨時政府，所以必須盡可能努力使得羣衆以後能夠推翻臨時政府。

整個四月會議都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即：我們究竟是要以社會主義革命之名向着奪取政權前進呢，還是要幫助（誰個）去完成民主革命呢？不幸四月會議底記錄直至今日尚未公布，雖然本黨歷史上尙未曾有一次會議，如一九一七年四月那樣，對於我們的革命運動含有如此特殊而直接的意義的。列寧底立場是這樣：不妥協的鬥爭反對保衛主義及其主持人；征取蘇維埃多數；推翻臨時政府；經過蘇維埃奪取政權；革命的和平政策；本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外國世界革命。反對派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爲必須向臨時政府施行壓力以完成民主革命，在此過程中蘇維埃始終是「監督」資產階級政權的機關。由此產生了另一個非常妥協的態度，對於保衛主義。

反對列寧立場的一個人在四月會議上有如下的議論：「我們說起工兵代表蘇維埃時，好像在說着一種組織中心，集中着我們的力量和國家政權。……但蘇維埃名稱就已表示：這些乃是小資產階級力量和無產階級力量聯合機關，尙在擔負着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倘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那麼這個聯合就不會存在的，……無產階級也就要進行革命的鬥爭反對這個聯合的。……然而

現在我們還是承認蘇維埃爲力量組織之中心。……由此可見資產階級革命尙未曾完成，尙未曾竭盡力量，而且我相信，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承認：資產階級革命一經完全成功，政權就要確實落於無產階級手裏的。（引自卡明尼夫同志的演說。）

這個議論底無可救藥的死板，是顯而易見的。因爲問題底癥結恰在於：政權沒有變換主人，「資產階級革命完全成功」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上面的演說漠視了革命底階級軸心；而且並非從階級力量底真實分合上推出黨底任務，而是從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形式定義上推出黨底任務。據說，我們必須參加那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監督資產階級的政權，直至於資產階級革命完全成功而後已。這個公式顯然是門雪維克的。既然如學究一般拿革命定義（「資產階級的」革命）來限制革命底任務，那自然要走到這個路線：監督臨時政府，要求牠實行不割地等等的和平政策。完成民主革命，也自然被瞭解爲經過立憲會議而實行的種種改良！此外，布爾雪維克黨又被分派在立憲會議中佔左翼地位。在這種前提之下，「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自然失去任何實際意義了。這一點，新近逝世的諾更在四月會議上表示得最明白和最徹底，他也是屬於當時反對派的：「在發展過程中，蘇維埃那些最重要的職能將消失的。許多行政上的職能將移交於市機關縣機關及其他組織。倘若我們審查一下國家結構底未來發展，我們就不能否認：立憲會議將召集起來，以後議會亦將召集。……如此，蘇維埃那些最重要的職能就將漸漸消失了。然而這並不是說蘇維埃要蒙受恥辱死去的。蘇維埃不過是移交職能罷了。在這些蘇維埃底下，我們將並不要去建立我們國中的公盟共和國的。」

最後，第三個反對者，則從俄國未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之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如果提

出無產階級革命口號，那麼我們有希望得到羣衆贊助麼？俄國是歐洲最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不能希望羣衆同情於社會主義革命。因此，黨愈加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就愈加要縮小成了一種宣傳的團體。社會主義底革命推動力必須是從西方來的。」以下又說：「社會主義革命太陽從何處昇起來的呢？我相信，照一切狀況和一般文化水平看來，決不是由我們來發起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缺乏必需的力量，社會主義革命底客觀條件並不存在於我們國內。但在西方，這個問題就提出來了，正像我們國內提出推翻帝制問題一般迫切。」

在四月會議上反對列寧觀點的人，並非個個都能做出諾更那種結論的；但是幾個月之後，即臨十月時候，個個在邏輯上都不得不接受那種結論了。我們若不起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便必須在資產階級會議中佔據反對派地位，——問題便是這樣在我們的黨內提出來。第二個立場完全明顯是本質上屬於門雪維克派的立場，或寧可說是二月革命之前門雪維克派不得不採取的立場。事實上，門雪維克派好多年來都在宣傳着底下的思想：即將到來的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底政府祇能履行資產階級任務，社會民主黨不能擔負起資產階級民主任務而必須保持反對派地位，「推動資產階級左傾」。這些思想，馬丁諾夫發揮得最透徹。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革命一開始，門雪維克派便在政府裏面找到位置。他們的整個「原則上」立場，現在祇剩下一條政治結論了，即說：無產階級不可奪取政權。攻擊門雪維克派做官，而又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那些布爾雪維克派，事實上很明顯地是轉移

到革命以前門雪維克派底立場去了。

革命使得政治主張在兩個方向移動，一方，反動派變成了立憲民主黨人，而立憲民主黨人變成了

共和派，這是純粹形式上的向左移動，且都非出於自願的；他方，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則變成了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黨，這是向右移動。這些本是資產階級社會圖謀替政權、穩定、秩序造成新的骨架時，所用的手段。但是正當門雪維克派從形式的社會主義立場走到庸俗的民主立場之時，布爾雪維克右派就走到形式的社會主義立場，即昨日的門雪維克立場來了。

勢力底分化和結合，是發生於戰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除了若干學究，都唱同一個調子：不割地，不賠款，——尤其因為割地希望已經是很微弱的了。屬於青梅瓦爾特傾向的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曾經罵過法國社會主義者之保衛自己的資產階級共和祖國；但他們一經覺得自己是俄國資產階級共和國一部分，就立刻變成保衛主義者了。他們從消極的國際主義立場，轉移到積極的愛國主義立場。同時，布爾雪維克派又轉移到消極的國際主義立場（向臨時政府施行壓力，迫牠去進行「不割地不賠款」的民主和平）。如此，在四月會議上：「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便在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分裂開來而從其中產生出兩種正反對的觀點了：一種是以形式的社會主義保留條件來掩飾的民主觀點，另一種則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觀點，真正布爾雪維克的和列寧主義的觀點。

七月事變，哥尼洛夫叛亂，民主會議和預備國會

四月會議底決議，給了黨以一個正確的原則上方向，但並未會消除黨上層分歧意見。恰好相反，隨着事變發展，這些分歧意見更加表現為具體的形式，直至革命最緊急頃刻即十月那幾日達到了最尖銳的表現。

六月十日組織一個示威的意圖（由列寧起意的），被那些不滿意四月示威的同志罵為冒險。六月十日示威沒有舉行，因為蘇維埃大會禁止牠，但六月十八日黨復了仇。妥協派很鹵莽地在彼得格拉發起一個總示威，而此示威差不多完全在布爾雪維克口號之下舉行的。然而政府還是走牠自己的道路。政府很輕率地下令在前線舉行一個愚蠢的進攻。這是一個緊急關頭。列寧警告黨不可輕舉妄動。六月二十一日，列寧在真理報上寫道：「同志們，在這時機來個示威是不適宜的。現在我們不得不渡過我們革命中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全集第十四卷第一部第二七六頁。）但七月事變還是發生了，——這是革命道路上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也是黨內爭論道路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七月運動中，彼得格拉羣衆底自發猛攻，帶來了緊急關頭。列寧在七月間，心裏無疑考慮着如下問題：「時機到了麼？羣衆情緒超過蘇維埃上層建築了麼？我們會被蘇維埃法統所催眠麼？我們會落於羣衆背後，而同羣衆隔斷關係麼？」七月那幾日中間，有些零碎的純軍事的行動，也許是一些同志發起的，他們誠心以為他們並不離開列寧對於時局的估量。列寧以後寫道：「我們在七月間做了許

許多多的蠢事。」但七月事變底要點乃是我們又在運動底更高的新階段上做了一次更充實得多的斥候戰。在危險的條件之下，我們不得不退兵。準備暴動和奪取政權的黨，如列寧說的，認為七月示威不過是一個插話，在此插話之中我們爲了檢查自己的和敵人底力量而付出很貴的代價，但此插話並不能改變我們的活動底主要路線。他方面，那些反對奪取政權路線的同志，則必然認七月插話爲一種有害的冒險。黨內右派分子更加積極動員起來，他們的批評更是無所忌憚的。同時反駁他們的口氣，也是對應着改變了的。列寧寫道：「所有這些悲啼，所有這些議論，說什麼『不需要參加』（爲的圖謀使羣衆應分的不滿和憤怒能夠『和平而有組織地』表現出來！）的話，若是出於布爾雪維克口裏，那就等於背叛，否則就是出自小資產階級本質上的怯懦和糊塗了。」（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二八頁）「背叛」這個字眼使用出來可以表現意見分歧至何等深度。事變發展下去，這個不祥的字眼也更加常用了。

對於政權問題和戰爭問題之機會主義態度，自然也決定了對於國際的同樣態度。右派圖謀把黨拉入社會愛國派在斯篤克霍姆開的會議去。八月十六日列寧寫道：「八月六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卡明尼夫同志那篇關於斯篤克霍姆會議的演說，凡是忠實於自己的黨和自己的主義的布爾雪維克派，都不能不反對的。」（同上，第五六頁）以後論到某些人說的革命大旗已飄揚於斯篤克霍姆城上時，列寧又寫道：「這是欠爾諾夫式的和崔勒脫里式的空洞的誇口。這是無稽的謊言。在斯篤克霍姆城上飄揚着的，並不是什麼革命旗幟，而是馬販子旗幟，妥協旗幟，互相赦免旗幟，社會帝國主義旗幟，銀行家談判分配割地旗幟。」（同上，第五七頁）

到斯篤克霍姆去的道路，事實上乃是到第二國際去的道路，正如參加預備國會事實上就是走向資產階級共和國去一般。列寧贊成抵制斯篤克霍姆會議，正如他以後贊成抵制預備國會一樣。在鬥爭正熱之中，他一刻也不忘記了創造新的國際的任務。

早在四月十日，列寧就提議改變黨底名稱了。反對新名稱的一切意見，他給以評論道：「這些議論乃是一些慣習議論，麻木議論，停滯議論。」他堅持着說：「現在正是脫下穢衣而穿上潔衣的時候了。」然而黨內上層底反對還是很有力的，必須再過一年，——在此一年中，全俄國都脫去資產階級統治底穢衣了，——黨才能決定採取新的名稱，而回轉到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傳統去。黨底這個易名事件，可以作為一個象徵，表示一九一七年全年中列寧底作用：在歷史底最急劇的轉灣點上，他在黨內進行一個熱烈的鬥爭，爲了未來的日子去反對過去的日子。同時，擁護過去日子的反對派，在「傳統」旗幟之下，又異常囂張了。

哥尼洛夫叛變使時局急劇轉向而有利於我們，黨內的衝突因此緩和了一點；但緩和而已，並未消滅。那幾日，右派之中產生了一個傾向，要在保衛革命及部分地保衛祖國基礎之上去接近蘇維埃中多數派。列寧對此傾向的反對，表現在他九月初致中央委員會書信裏面。他寫道：「我深信，這些人是缺少原則的^{*}，他們走入保衛主義^{*}，或（如其他布爾雪維克派一樣）去同社會革命黨聯合，贊助臨時政府。這是非常錯誤的。這是無原則的。惟有政權落於無產階級手裏以後，我們才肯做保衛主義者：」以後又說：「甚至現在，我們也不可以贊助克倫斯基政府。這是無原則的。你們會問道：「我們

*原註：從文字構造看來，此處顯然提起了甚麼人名字，但被刪去了的。

不應當去打哥尼洛夫麼？「自然應當去打的。但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這中間有條界線隔離着；有些布爾雪維克派讓自己被事變潮水湧走，越過這條界線而走入「妥協主義」去了。」（同上，第九五頁）

爭論底次一階段，就是民主會議（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和接着開的預備國會（十月七日）。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底任務，就是要拿蘇維埃底法統去拘束布爾雪維克派，然後毫無困難地轉變蘇維埃底法統為資產階級議會法統。黨內右派是準備歡迎這個辦法的。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如何揣測革命底未來發展：蘇維埃將漸漸移交其任務於相當機關（市政局，紳董會，工會，最後立憲會議），並將自動地退出舞台面。經過預備國會孔道，羣衆底政治意識從那「臨時的」和漸漸死去的蘇維埃移開，而引至立憲會議去，立憲會議乃是民主革命底浮屠合尖。但這個時候，布爾雪維克派已經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兩蘇維埃中佔得多數了，我們在軍隊中的影響也增長起來，並非一天一天增長，而是一點鐘一點鐘增長。此時已經不是診斷或前途問題了，此時實在是：「明天我們如何行動」問題。

民主會議上，那些完全耗竭了的妥協黨派之行爲，表現了小氣和卑鄙。我們提議以示威的形式退出民主會議，竟遭遇黨團中右派分子方面堅決的反對，這些分子在黨上層還是有力量的。這個問題的爭論遂成了以後抵制預備國會問題鬥爭底前奏曲。九月二十四日，即民主會議以後，列寧寫道：「布爾雪維克派當時應當退出會議以示抗議，同時也是爲的不落入會議設下的圈套，使得民衆分心不去注意一切嚴重的問題。」（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一四四頁）

民主會議中布爾雪維克黨團關於抵制預備國會問題的辯論，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雖然問題

範圍比較狹小。事實上，這次辯論是右派方面最廣大的，而且表面上最有成效的努力，把黨拉上「完成民主革命」道路去。此次辯論好像未曾有記錄，總之沒有記錄留下來；據我所知，連秘書的簡短記載也未曾發現的。本卷編輯人，在我自己的文件之中尋到了幾張小條子。卡明尼夫同志提出一種議論，這議論後來發揮為更銳利的和更確定的形態，包含於有名的「卡明尼夫和齊諾維也夫告黨組織書」（十月十一日）裏面。從原則方面提出此問題的，最明白的還是諾更，他說：抵制國會組織就是號召暴動，就是覆演七月事變。其他同志則根據社會民主黨議會策畧上一一般的理由。他們大意說：「沒有人敢提議我們要抵制議會，但是有人提議要抵制這同一機關，祇因為牠名叫「預備國會」罷了。」

右派底根本思想如下：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離開蘇維埃而走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去的；預備國會乃是這個過程中自然的一環；我們既然決定在議會中佔據左方議席，那麼我們拒絕參加預備國會就是愚蠢的。必須完成民主革命和「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怎樣去準備呢？祇有經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學校。因為前進國顯示落後國以後者未來形態。推翻俄國帝制，是革命的，——牠以革命手段完成了，——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則被設想為經過議會道路，依據在完全成功的民主之上。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必須有好多年的民主制度存在。爲了我們參加預備國會而鬥爭，乃是爲了工人運動「西歐化」而鬥爭，乃是爲了引導工人運動儘可能快地走上民主的「奪取政權」道路，即走上社會民主黨道路，而鬥爭。民主會議中，我們的黨團竟有一百多人，與黨大會差不多，尤其在那幾日。黨團大多數表示贊成參加預備國會。這個事實本身就足夠引起驚慌了：從那個時候起，列寧就不斷地敲着警鐘。

正當民主會議開會時候，列寧寫道：「我們如果把民主會議看成一種議會，那就是極大的錯誤和愚蠢，因為即使牠自己宣布爲一種議會，爲革命底最高權議會了，牠也不能決定什麼。最後的決定是在牠以外，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工人區裏面的。」（全集，第十四號，第二部，第一三八頁）列寧對於參加或不參加預備國會的意見，可以從他的好多言論中搜集出來，尤其可以在九月二十九日他致中央委員會信中找到，裏面他說起了「布爾雪維克派犯着如此嚴重的錯誤，如無恥地決議參加預備國會之類。」在他看來，這個決議乃是那個民主幻想和小資產階級動搖之表現，爲他所反對的；他在這個鬥爭過程中發揮了和完成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說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要隔許多年頭，——這話是不對的。說是議會制度學校，乃是奪取政權所要經過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或強迫性的學校，——這話是不對的，說是到政權的道路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政制，——這話也是不對的。這些話都是赤裸裸的抽象化，學究氣的圖式，其政治作用祇有一個，即束縛無產階級前鋒隊底手和足，又借助於「民主的」國家機器，使這前鋒隊成了資產階級底反對派政治影子，其名曰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政策切不可受小學生圖式去指導的，而應當追隨階級鬥爭底真實潮流。我們的任務並非要走到預備國會去，而是要組織暴動和奪取政權。其餘的以後再看。列寧甚至提議召集一個黨緊急大會，提出抵制預備國會作爲政綱。自此以後，他的書信和論文都打擊在一個點上，即是：我們必須前進，但並非走入預備國會，去做「妥協派」底革命的尾巴，而是走到街上去，爲奪取政權而鬥爭！

十月革命前後

事變表明緊急大會是不必要的。列寧施行的壓力使得中央委員會和預備國會黨團勢力左移了。十月十日布爾雪維克派退出預備國會。在彼得格拉，蘇維埃同政府發生了衝突，爲了政府發布的調防命令，這命令將衛戍軍中同情布爾雪維克派一部分的兵士調到前線去。十月十六日，蘇維埃下合法的暴動機關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黨內右派圖謀延緩事變底發展。黨內派別鬥爭以及國中階級鬥爭，都進入其決勝負的階段。齊諾維也夫和卡明尼夫簽名的一封信論時局的信，在原則方面最清楚而完全地表明右派立場。此信寫於十月十一日，即暴動之前二個星期！係致黨內最重要組織的信，爲的堅決反對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武裝暴動決議。信內警告人們不要過低估量敵人，而其實乃是異乎尋常地過低估量革命力量，甚至否認羣衆有鬥爭情緒（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二個星期！），其中有幾句說道：「我們深深確信，此時宣布立即武裝暴動不啻是孤注一擲，不僅拿我們的黨底命運來賭哩，而且是拿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底命運來賭的。」但既然談不上暴動和奪取政權，那麼做甚麼好呢？信內的回答也是很明白而確切的：「我們在軍隊和工人方面，都是拿了一把手槍對準資產階級腦殼，」爲了這把手槍原故，資產階級是不會取消立憲會議的。「在選舉立憲會議中，我們的黨底希望是很好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影響一天增加一天。……若有正確的策畧，我們可以在立憲會議之中佔據三分之一位置，或者比三分之一還要多些。」如此，這信是公然提倡一種路線，即我們在資產階級立憲會議中發生一種

「有影響的」作用的反對派路線了。這種純粹社會民主黨路線，表面上是拿以下的議論來遮飾的，即說：「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蘇維埃已經根深蒂固了，決不會被摧毀的。……立憲會議本身也祇能建立其革命工作於蘇維埃之上。立憲會議加蘇維埃，——這便是我們所趨向的國家制度配合形態。」這個「配合的」國家形態論，即立憲會議和蘇維埃並立共存制，一年半或二年之後，又被魯道爾夫·希爾費定（註一）提出於德國了，——這個事實對於說明右派整個路線是非常有意義的。希爾費定也會進行一個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位奧籍德人機會主義者不曉得他原來抄襲了別人的理論。

論時局的信駁斥一種以爲俄國人民大多數都已經擁護我們的說法，而站在純粹議會式觀點來估量這個多數。其中有幾句話說：「在俄國，工人大多數是同我們一起的，兵士中一大部分亦然。此外一切都是可疑的。我們都確信，如果選舉立憲會議，農民大多數就要投社會革命黨底票。這是偶然的麼？」

上面那樣提出問題，含有原則上和根本上的錯誤，乃是出於不明白：農民雖有重大的革命利益，而且迫切去求取他們的利益，却不能有一個獨立的政治立場。他們不是投社會革命黨底票，因而投資產階級底票（社會革命黨就是資產階級代理人），便是與無產階級共同行動。這二個可能性究竟實現那一個，恰恰要看我們進行的政策如何。如果我們加入預備國會去，爲了準備將來在立憲會議，佔據一個有勢力的反對派地位（「三分之一，或者比三分之一還要多些」），那麼我們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安置農民於一個地位之上，迫得他們經過立憲會議去滿足他們的利益了；如此一來，農民就不希望反對派能給他們利益而走去希望多數一派了。他方面，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也立刻替農民造成了革

命的局勢；便利他們從事於反地主和反官吏的鬥爭。借用我們中間在這一問題上很流行的一句話來說，這封信恰恰是：把農民同時估量得過低又估量得過高。這信過低估量了農民意革命潛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同時又過高估量了農民底政治獨立。把農民同時估量得過低而又過高的這個雙重錯誤，乃是從另一個錯誤出來的，即是：過低估量了我們自己的階級及其政黨，亦即是以社會民主黨眼光去看無產階級。而這是絕非出人意外的。一切種類機會主義，最後分析起來，都可說是出於不正確估量無產階級底革命勢力和潛能。

這封信一面反對奪取政權，一面又拿革命戰爭遠景來恐嚇黨。「兵士羣衆擁護我們，因為我們提出的不是戰爭口號，而是和平口號。……若是我們現在單獨奪取政權，若是我們為整個世界局勢所迫不得不進行革命戰爭，那麼兵士羣衆就要離開我們。青年兵士中最好的部分自然留在我們一邊，但是大多數兵士羣衆要離開我們的。」這個推論路線，是有最高的教訓意義的。後來贊成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註二）和約的根本理由已具備於此了，但此時，這些理由則是用來反對奪取政權的。論時局信內表示的立場，後來顯然促進了站在此立場的人很容易去贊成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我們現主要重覆幾句我們在別處說過的話，即是：列寧底政治天才並不在於他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暫時的屈服看做一件孤立事實的，他祇能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同十月配合起來看。這一點是必須時刻牢記在心的。

工人階級時時記得優勢力量是屬於敵人方面的，工人階級就是時時在此意識之下而鬥爭而成熟的。這個優勢表現在日常生活裏面，每走一步都表現出來。敵人具有財富，政權，以及一切精神上和

物質上壓迫手段。我們習慣於優勢在敵人方面這個觀念了，這個習慣的思想成爲準備時期中革命黨整個生命和行動之一部分。每次疏忽的或未成熟的行動之結果，都是最無情地令人記起了敵人底勢力。但到了某個時候，這種把敵人勢力看作強過自己的習慣，反而成爲到勝利路上去的主要障礙物了。資產階級今日的柔弱好像可以拿牠昨日強盛底影子來遮掩的！「你過低估量了敵人底力量！」——這個呼聲成了一根中軸以團結一切反對武裝暴動的分子。我們勝利之前二個星期，反對在我們國內實行暴動的人寫道：「凡是超過純粹閒談以上而議論暴動的人，必須清醒地估計一下暴動底得失。這裏，我們覺得責任上不得不說：輕視敵人力量和誇大自己力量，現在能夠造成最大的禍害，敵人底力量比表面上所見的還要大些。彼得格拉決定勝負，——但在彼得格拉無產階級黨底敵人集中了龐大的力量：五千名軍官生，配備和組織都很好，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又渴欲戰鬥，而且能夠戰鬥；此外還有軍區司令部，此外還有突擊隊；此外還有哥薩克兵；此外還有衛戍軍中頗大部分；此外，又有以扇形包圍彼得格拉的砲兵中很大部分。除此以外，我們的敵人依靠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幫助，也差不多一定要從前線調兵回來的。」（論時局）

在國內戰爭中，問題並不在於計算現成的軍隊數目，而在於衡量各軍隊的意識狀態；這種衡量自然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或不能估量得恰好的。連列寧也以爲敵人有強大力量在彼得格拉；他提議暴動應在莫斯科開始，因爲他想那裏差不多可以不流血而成功的。估量事變時犯着這樣的部分錯誤，雖在最順利的條件之下也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而且根據較不順利的條件來擬定計劃總比根據較順利的條件好些，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要注意的乃在於：敵人底力量被異乎尋常地誇張了，越過了一切限

度，而其實此時敵人是什麼武裝力量都沒有的。

如以後德國經驗所證明，這個問題是異常重要的。當德國共產黨領袖們主要地（縱非唯一地）從鼓動觀點來處理暴動口號時候，他們乾脆地抹煞了敵人操縱的武力（國防軍，法西斯隊伍，警察等）問題。他們好像以為革命潮流不斷地增長會自然而然解決了軍事問題。但是暴動任務提出他們面前時候，以前把敵人底武力看作彷彿不存在的那些同志，便立刻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他們盲目地信任了關於資產階底武力的一切統計，很詳細地將國防軍和警察算入資產階級武力之內，然後以總數概括之（半百萬或更多些），如此得到一個廣大而強壯的武力，武裝齊備，絕對足夠癱瘓他們自己的努力的。無疑，德國反革命勢力，在數量上比我們的哥尼洛夫派和半哥尼洛夫派強大得多了，而且無論如何組織和準備也比較好些。但是德國革命底實際力量，也比我們強大得多呀！無產階級構成了德國人口中壓倒的多數。在我們國內，——至少開始的時候，——問題是由彼得格拉和莫斯科決定的。在德國，則暴動可以同時爆發於二十幾個有力的無產階級中心。在這鬥爭舞台上，敵人底武力將不似統計上數目那樣可怕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堅決排斥那種有所為的計算，於德國十月失敗之後，拿來替那致成此失敗的政策作辯護的。我們的俄國先例對於此點具有很大的意義。我們在彼得格拉得到不流血的勝利以前兩個星期，——我們也可以更早兩個星期得到勝利哩，——黨內有經驗的政治家看見了軍官生，突擊隊，哥薩克，衛戍軍和砲兵中一大部分，以及從前線調回來的軍隊，在列成陣勢反對我們。但是事實上，所有這些都不存在的；總數說來，等於零而已。現在我們試設想，那些反對暴動的人在我們的黨內和中央委員會內得到勝利了，事情將變得怎麼樣呢？國內戰爭之中領導機關底作用是

太明白了：在那種情形底下，革命預先註定要失敗的，——倘若列寧不出來號召黨反對中央委員會，列寧當初確會準備這樣做，他也無疑會得到勝利的。但在類似情形之下，並非每個黨都有其列寧。：不難設想：逃避鬥爭的路線若在中央委員會得勢了，歷史又將如何寫成的。那時，官式歷史家自然要解釋，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暴動簡直是發瘋，他們自然要供給讀者以令人驚嚇的統計數目，關於軍官生，哥薩克，突擊隊，砲兵，以及從前方調回隊伍的。這些武力若是未曾暴動之火試驗過，一定比較實際表現的可怕得無限多些。這個教訓乃是每個革命者應當牢記在心的！

九十兩月中，列寧向中央委員會施行的頑強而不斷的壓力，乃是出於他不斷地害怕我們會放過有利的時機。右派則回答道：這一切都是胡鬧，我們的影響將繼續增長下去的。那方面是對的呢？放過有利的時機究竟表示什麼意思呢？這個問題直接包含一種爭論在內，在此爭論之中布爾雪維克派之估量革命道路和手段完全異於社會民主黨的或門雪維克派的估量：布爾雪維克派底估量是完全積極的實際的和含有戰畧意義的，門雪維克派底估量則是完全浸透了宿命論精神。放過有利時機究竟表示什麼意思呢？勢力關係上發生了最有利於我們的變動時候，顯然有了暴動底最有利的條件。我們說的勢力關係自然是屬於意識領域方面的，即政治築物方面的，而非屬於經濟基礎方面的。經濟基礎，在整個革命時期，多少是固定不變的。在同一經濟基礎上，同一階級分化之下，勢力關係隨着無產階級羣衆情緒而變化，隨着羣衆幻想打破和政治經驗增加程度而變化，隨着中間階級和集團對於政府信任心減少程度而變化，最後隨着這些階級和集團對於自身信任心減少程度而變化。當革命時候，所有這些過程發生得像閃電一般迅速。整個策畧藝術，就在於如何抓住那局勢配合最有利於我們的時機。哥尼洛

夫反叛事件完全準備好了這個配合。羣衆不信任蘇維埃中佔多數地位的黨派了，羣衆親眼看見了反革命危險。他們走到了這個結論，即：現在要靠布爾雪維克派從時局中找一條出路了。無論政權底自然的解體，或羣衆底自然的耐而有所求的對布爾雪維克派的信任，都是不能經久的。危機必須解決的，不是這樣解決，便是那樣解決。「現在不成，永世也不成！」——列寧屢次說這話。

右派反駁道：「……將政權移入無產階級黨之手的問題，以「現在不成，永世也不成」方式提出來，乃是極大的歷史錯誤。不。無產階級黨將更加長大起來，牠的政綱將爲日益加多的羣衆所明瞭。……惟有走上一條道路，即惟有在現時局勢之下發起一個暴動，黨才會中斷其成功的。……我們提高我們的聲音警告這個破產政策。」（論時局）

這個宿命論的樂觀主義很值得詳細研究。這絕不是一民族的，尤其不是若干個人的。去年，我們才在德國看見同樣的傾向。這個消極的宿命論事實上也不過是一種掩護物，遮飾着遲疑不決，或行動無能而已；牠以一種令人快慰的診斷作保護色，即說我們的勢力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了，以後仍將隨時間而增加的。何等糊塗的幻想！革命黨底力量僅能增加至一定時候，過此時候過程本身可以變爲相反的方向。爲了黨底消極，羣衆底希望將變成失望，同時敵人從驚惶失措之中鎮靜下來，亦將利用此失望的。我們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間的德國看見了這個有決定意義的轉灣點。一九一七年秋天我們在俄國距離這種轉灣點也並不遠哩。那時，祇消再延緩幾個星期就要看見這個情況了。列寧說的不錯：「現在不成，永世也不成！」

反對暴動的人提出他們的最後的最有力的論據來了：「但是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却在於：首都工人

和兵士底情緒果真是認爲祇有在街道作戰才能得救麼？果真是努力趨向於作戰麼？不。沒有這個情緒。……即使首都廣大的貧窮羣衆有了鬥爭情緒，而且渴望衝到街上去的，那也須有個保證使得他們的意向能夠經過最廣大的和最重要的組織（鐵路工會，郵電工會等等）實現出來，在這些組織當中，我們黨底影響是很薄弱的。但既然工廠和兵營裏都沒有這個情緒，則依據於此情緒之上的一切計劃都是欺騙自己的。」（論時局）

這幾行字寫於十月十一日。倘若我們記起了德國黨內佔領導地位的同志，也是特別指出羣衆不願戰鬥的情形來解釋他們去年之不戰而退兵，則此幾行字就含有一個非常合時的意義了。但問題底癥結恰在於：羣衆若有充足的經驗，不肯輕率投入戰鬥，而要等待和要求一個堅決而能戰鬥的領導，此時，一般說來，暴動勝利就是最有把握的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工人階級羣衆，至少其領導的部分，已有堅定的信念，——根據四月示威，七月事變和哥尼洛夫叛亂等經驗之上，——認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再不是孤獨的自發的抗議了，也不是斥候的戰鬥了，而是一個決勝負的暴動，爲了奪取政權。羣衆情緒，與此相應，也更加專注，更有批評性和更深刻。從一種幻想的，激烈的，自發的情緒，過渡到一種更有批評性的和更自覺的心理狀態，必然引起革命連續性上有某種停頓。羣衆情緒上這種有進步性的危機，祇能拿黨底一種合宜的政策來克服的。即首先祇能拿黨有真實的決心和能力去領導無產階級暴動來克服的。他方面，一個黨做了長期的革命鼓動，使得羣衆解除了妥協派影響，而被羣衆底信任推到領導地位來，但以後就動搖了，畏葸了，延宕了，——這樣一個黨是要麻痺羣衆底活動，散播幻滅和解體，而致使革命破產的；但反過來牠就有了現成藉口——失敗之後——歸究於羣

象底不夠積極。這正是論時局的信所走的路線呀。幸而我們的黨在列寧領導之下決然能夠消除上層同志中這種情緒。單憑這個，牠就能夠領導暴動至於勝利了。

×

×

×

我們已經說明了與準備十月革命有關的那些政治問題底性質；我們也已經解釋了在這些問題上不同意見何在。現在我們要概畧地說說最後幾個星期中黨內鬥爭經過的一些最重要階段了。

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十日通過了武裝暴動決議案。十月十一日，上面分析的那封論時局的信寄發於一些最重要的黨組織。十月十八日，即暴動之前一星期，新生活報發表了卡明尼夫底信。信內寫道：「不僅齊諾維也夫同志和我，而且有好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都一致認為：現時，在這個勢力關係之下，我們若於蘇維埃大會好多日以前及不理會蘇維埃大會，而發起一個武裝暴動，那就是一個不可容許的步驟，有害於無產階級和革命了。」（新生活第一五六期，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五日，彼得格拉政權已經奪在手裏，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了。十一月四日，若干負責的同志辭去了黨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職務，提出一個哀的美敦書，要求組織一個蘇維埃各黨派底合作政府。他們寫道：「……若非如此，祇有依靠政治恐怖手段來維持一個純布爾雪維克政府之道路了。」（同時發出的另一個文件，又說：「中央委員會這個破產政策，我們不能分擔責任，——這個政策是違反了無產階級和兵士大多數人意志而採取的，這大多數人渴望着趕緊終止了民主派各部分之間血的衝突。為此之故，我們退出了中央委員會，以便表示我們的真意於工兵羣衆面前，號召他們起來擁護我們的叫喊：「蘇維埃各黨政府萬歲！」在此基礎之上立即妥協起來罷！」）十月革命，革命文庫，一九一七

年，第四〇七——四一〇頁）如此，那些罵武裝暴動和奪取政權爲冒險的人們，到了暴動勝利之後又要求將政權奉還給那些黨派了，無產階級正是爲奪取政權而同那些黨派鬥爭過的。事實上，勝利的布爾雪維克黨爲什麼要奉還政權給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呢？（這裏正是奉還政權的問題！）反對派回答道：「我們認爲，組織這樣一個政府是必要的，爲了防止：繼續的流血，迫在眉睫的饑荒，加雷定一流人的撲滅革命；又爲了保障立憲會議召集以及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通過的和平綱領底實行。」（同上，第四〇七——四一〇頁）換一句話說，這是經過蘇維埃大門替資產階級會議制度清除道路的問題。革命既然拒絕通過預備國會道路了，既然須得自己開掘一條道路通過十月了，那麼反對派所提出的任務就是在於借助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使得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而走到資產階級制度去。這裏的問題不多不少恰是取消十月的問題。在此條件之下，任何妥協當然談不到的。

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屬於同一路線的又有一信發表。「在常識以及羣衆底自發運動前面，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既然不肯考慮客觀條件，那我亦不能爲了黨紀律原故而緘默的，——客觀條件迫得我們非與一切社會主義黨派妥協不可，否則有破產之危險。……我也不能爲了黨紀律原故，屈服於個人崇拜，及因這人或那人參加政府之事，在政治上拒絕與那些同意我們基本要求的社會主義黨派妥協；同時我亦不願爲了這個原故再流一分鐘的血。」（工人報第二〇四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寫這封信的人（羅佐夫斯基）結果宣告：必須要求黨召集一個緊急大會，來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雪維克派）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黨不是，或這個黨應否採取一種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點的路線。」（同上）

局勢好像是完全無望的。不僅資產階級和地主，不僅那些還在操縱各團體上層機關（鐵委，軍隊委員會，政府僱員等等）的所謂「革命民主派」，而且我們自己黨內，中央委員會內和人民委員會內若干最有影響的同志——都一致地大聲公開責斥黨之企圖把持政權以便實行其政綱。我再說一遍，局勢似乎是無望的，倘若僅僅在事變表皮上看一看看的話。那麼怎麼辦好呢？答應反對派要求就等於取消十月暴動。既然如此，我們事先就不當暴動了。祇有一條道路留下來，就是依賴於羣衆革命意志之上向前進行。十一月七日，真理報發表了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底有決定性的宣言，——這是列寧起草的，充滿了真正的革命熱誠，以簡單明瞭而不錯誤的方式表示出來，面對着黨內下層同志說話。這個宣言公布出來，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底未來政策，就不容人有疑惑餘地了。「一切信心不堅的動搖的懷疑的人，要慚愧呀！一切因資產階級及其直接或間接僕人底呼喊而感受驚嚇的人，要慚愧呀！彼得格拉，莫斯科及其他地方工人和兵士羣衆毫無一絲疑惑影子。我們的黨一致而堅定，如同一個人，守護着蘇維埃政權，保衛着一切勞動者利益，首先工人和貧農利益。」

最尖銳的黨內危機克服過了。然而黨內鬥爭並未停止。鬥爭底主要線索仍舊不變的，但其政治重要性減輕了。十二月十二日，本黨彼得格拉委員會會議上，烏里茨基關於召集立憲會議的報告，就是最有趣味的證據。「我們黨內的爭論並非新起的。這裏，我們看見了以前關於暴動的問題表現出來的那種傾向。有些同志現在還以爲立憲會議是完成革命的工程。他們的立場建立在禮儀書上。他們說：我們不可鹵莽行事等等。他們反對布爾雪維克派之以立憲會議代表資格來決定召集日期及力量關係等等。他們從純粹形式觀點來看事物，而完全不去考慮：這個監督之施行僅僅反映立憲會議以外發生的

事變而已。考慮了這個，我們就能夠確定我們對於立憲會議的態度。……現在我們的觀點乃是：我們是爲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利益而戰鬥的；但有些同志則認爲：我們做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也須以立憲會議完成之。」

解散立憲會議，我們可以認爲，不僅俄國歷史結束一大段落，連我們的黨史也結束一大段落了。克服了內部磨擦之後，無產階級黨不僅奪得政權而已，牠也能夠維持政權了。

(註一) 希爾費定 (Rudolf Hilferding) 德國社會民主黨重要領袖之一，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奧地利學派重要理論家，著有財政資本。大戰時屬於考次基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中派，一九一七年加入獨立社會黨，後來又回到社會民主黨去。他在資產階級的內閣中當過部長。

(註二)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在波蘭東部，第一次大戰前屬於俄國，戰後則屬於波蘭，第二次大戰中波蘭滅亡後，根據德蘇協約此城歸蘇聯所有，但德蘇戰爭一開始，此城便爲德國軍隊所佔據了。十月革命後，俄國和德國在此間媾和談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和約簽字，俄國須付多量賠款和割讓廣大土地。這是必要的，爲了讓革命有個喘息機會，爲此和約問題，布爾雪維克黨內曾有激烈爭論。

十月暴動與蘇維埃「法統」

九月間，當民主會議正在開會時候，列寧要求我們立即進行暴動。他寫道：「倘若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眼光來看暴動，即是說，倘若我們把暴動看成一種藝術了，那麼我們就必須毫不延緩地立即組織一個暴動軍司令部，布置我們的武力，安插可靠的隊伍於最重要的據點，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據彼得保羅堡壘，逮捕司令部和政府，派遣一些寧願戰鬥而不肯讓敵人進至城中心來的隊伍去對付軍官生和野蠻師。我們必須動員武裝的工人，號召他們作最後的決死戰；我們必須立即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而設立我們自己的暴動司令部在電話局裏面，以便同一切工廠，一切兵團和一切戰鬥中心相連絡等等。——自然，以上不過是些提示而已，爲的闡明這事實，即是：到了一定時機，若不將暴動看成一種藝術，我們便不能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和革命了。」（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一四〇頁）

這個問題照上面方式提出來，乃是預先假定革命是經過黨底孔道並以黨名義去準備和完成的，勝利以後才叫蘇維埃大會去批准。中央委員會並未會採納這個提議。暴動被引到蘇維埃孔道上去，而且在我們的鼓動之中與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聯繫起來。這方面爭論底詳細解釋將使我們明白：這並不是原則問題，而是具有很大的實際重要性的技術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了，列寧看見暴動延不舉行時，心裏是何等着急。爲了黨上層分子動搖的原故，一種形式上將那即將到來的暴動，聯繫於那即將到來的蘇維埃大會之鼓動，在列寧看來，是不可容許的

延緩，是讓步於遲疑不決，是因動搖而空過時間，是明顯的罪惡。從九月底以後，列寧就不斷地重覆這個思想。

九月二十九日，他寫道：「我們裏面，中央委員會和黨上層裏面，有一種傾向或一種觀念，主張等候蘇維埃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暴動。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傾向或觀念。」

十月初，列寧寫道：「延緩是罪惡。等候蘇維埃大會是小孩子般玩弄形式，——一種可恥的玩弄形式，背叛革命。」

在他替十月八日彼得格拉會議寫的提綱上，列寧說道：「我們必須攻擊那對於蘇維埃大會的憲政幻想和希望。我們必須排斥那認為我們應當等候召集大會等等的成見。」

最後，十月二十四日，列寧又寫道：「現在再延緩革命，那就是死路一條，這是如白日一般明顯的。」接着他又說：「歷史將永遠不肯寬恕革命者那種拖延的，他們今天本可（而且一定要）勝利，但他們寧願明天冒更多損失之危險，——甚至損失一切之危險。」

這些條件，每句話都是在革命砧子上鎚成的，無論在表明列寧性格方面或估量當時局勢方面，都有特殊的價值。所有這些信件之中，根本的和始終不變的思想，乃是抗議，氣憤和着急，反對一種宿命論的延宕的社會民主黨的和門雪維克式的對付革命態度，——好像將革命看作一種無窮無盡的電影片。倘若一般說來時間是政治上第一因素，那麼在戰爭和革命中時間重要性更增加一百倍了。凡是今天能夠做的事情，並非件件都能留到明天做的。武裝在手，推翻敵人，奪取政權，今天是不可能的，明天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是奪取政權乃是改變歷史行程。這樣一種歷史大事變果真能夠依賴於二十四個

鐘頭距離麼？不錯，是能夠的。如果達到了武裝暴動之點，事變就不是拿政治長尺來測量了，而是拿戰爭短尺來測量。空過幾星期，幾天或甚至一天，在某種條件之下就屬於背叛革命，等於投降。若無列寧敲響警鐘，若無他那裏來的壓力和批評，若無他的熱情洋溢的革命的自信，黨多半不會在決勝負的頃刻整齊牠的隊伍的，因為黨底上層底反對力量是很強大的，而參謀部在一切戰爭之中（連內戰在內）又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然而同時，也十分明白，在準備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掩護之下，在保衛這個大會的口號之下，來準備和實行暴動，這對於我們有着不可限量的便宜處。自從我們以彼得格拉蘇維埃資格註銷了克倫斯基底調遣三分之二衛戍軍往前線去的命令以後，我們事實上就進入武裝暴動狀態了，列寧當時不在彼得格拉，不能估計這個事實底完全意義。據我所知，他這時期寫的信中，也未會有一句話提起這個事情。其實，自從我們反對調遣衛戍軍，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十月十六日），任命我們的特派員於各部隊和各機關，因而致使彼得格拉軍區司令部和政府都完全孤立起來以後，十月二十五日暴動已有四分之三解決了，即使沒有解決得更多些。事實上，這是在準備保衛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口號之下，受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的一個武裝暴動，——彼得格拉衛戍軍各團反對臨時政府的一個武裝暴動，雖然是不流血的暴動。此次蘇維埃大會將決定政權底最後命運的。列寧主張在莫斯科開始暴動，據他估計，那裏我們可以得到不流血的勝利；他的這個主張正是由於這個事實出來的，即是：在他的躲藏生活中，他沒有機會估計十月中旬首都衛戍軍「和平的」暴動之後，士兵羣衆和軍官中間情緒上和組織關係上那種根本的改變。從各團依照革命軍事委員會訓令拒絕離開首都時候起，首都就已經有個勝利

的暴動了，不過上面被資產階級民主國形式殘餘所掩護，不大看得見而已。十月二十五日的暴動不過含有補充性質。正爲此故，那日的暴動才是沒有痛苦的。他方面，在莫斯科，鬥爭就更長久些，而且流了更多的血，雖然那時人民委員會政權已經建立於彼得格拉了。暴動若先開始於莫斯科，則顯然還要拖得更長久些，而其結果能否勝利也是可疑的。莫斯科的失敗對於彼得格拉定有重大影響。自然不是說，如此一來勝利就沒有希望了。但是事變實際經過的道路仍證明是更經濟些，更順利些，而且更成功些。

我們所以能或多或少使得奪取政權和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同時舉行，這僅僅因爲和平的差不多「合法的」武裝暴動——至少在彼得格拉——已有四分之三成就了，即使不是十分之九成就了的。我們稱這個暴動爲「合法的」，意思是說：這是雙權政制「常態」條件發展的結果。當初妥協派支配彼得格拉蘇維埃時候，也往往發生蘇維埃修正或更改政府決議之事。這可以說本是歷史上稱爲「克倫斯基時期」的政治制度一個部分。我們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中取得勝利之後，不過繼續和加深雙權政制底方法而已。我們自己拿了這個方法去修改政府調遣衛戍軍赴前線之命令。以此手段，我們就拿合法的雙權政制底傳統和方法把彼得格拉衛戍軍真實的暴動掩飾起來了。不僅此哩！我們形式上將我們爲政權問題的鼓動結合於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而同時發展和加深已有的雙權政制傳統，並替全俄國範圍的布爾雪維克暴動準備下蘇維埃法統基礎。

我們並不是拿什麼蘇維埃法統幻想去麻醉羣衆的，因爲在那爲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而鬥爭的口號之下，我們征取革命軍隊底刺刀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而且從組織上鞏固了我們的勝利品。此外，我們又

超出預料之外，居然引誘我們的敵人那些妥協派走入了蘇維埃法統圈套。在政治中，尤其在革命中，施行詭計之事總是危險的。你多半騙不了敵人，但是跟着你走的羣衆反而上了當。我們那次「詭計」却是百分之百成功了的，並非因爲這是一個詭詐計劃，出於詭詐的戰畧家之手，避免一個國內戰爭，而是因爲這是從妥協派政制底解體及其顯然的矛盾之中自然而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要排除衛戍軍，兵士則不肯往前線去。我們給予兵士這個自然願望以一種政治的表現形式；我們給予牠以一個革命的目的和一個「合法的」外衣。所以我們在衛戍軍中造成了空前的一致，而且使兵士與彼得格拉工人密切聯繫起來。反之，我們的敵人，則爲了他們的無望立場和他們的頭腦糊塗原故，傾向於相信這件蘇維埃外衣。他們願意受人欺騙，而我們也就供給他們豐富的機會以實現他們的願望。

妥協派和我們之間，有個鬥爭，爲了奪取蘇維埃法統。在羣衆意識中，蘇維埃乃是一切權力底源泉。克倫斯基，崔勒脫里和史高倍列夫都是從蘇維埃出身的。但我們自己則以我們的基本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密切地同蘇維埃聯繫起來。資產階級從舊國會接受政權。妥協派則從蘇維埃接受政權；我們亦然。但是妥協派要使蘇維埃化爲烏有，而我們則要轉移政權給蘇維埃的。妥協派尙未能與蘇維埃遺產決裂，正在趕緊架一座橋，要從蘇維埃走到議會制度去。懷了這個計劃，他們便召集立憲會議，設立預備國會。蘇維埃之參加預備國會，似乎是批准了這個辦法。妥協派想用蘇維埃法統做鞭子去捕捉革命，捉到以後把革命拉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孔道上去。

但是我們也要使用蘇維埃法統的。民主會議閉會時候，我們強迫妥協派答應召集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個大會陷妥協派於進退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若是反對召集大會，就非破壞蘇維埃法統不

可；他方面，他們也不能不明白，大會爲了代表成分原故，不會有利於他們的。所以我們更加堅持要上控於第二次大會，視之爲全國真正主人；我們更加拿我們的整個準備工作與支持和保衛蘇維埃大會配合起來，以抵禦反革命底不可避免的攻擊。倘若妥協派圖謀假手於那個出自蘇維埃的預備國會而拿蘇維埃法統來對付我們，那麼我們方面就要假手於第二次大會拿同一蘇維埃法統來對付他們了。在赤裸裸以黨奪取政權的口號之下來準備武裝暴動，這是一回事，在保衛蘇維埃大會權利的口號之下來準備和實行暴動，這又是一回事。如此，配合奪取政權問題於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並不含有任何天真的希望，以爲大會本身能夠解決問題的。如此把蘇維埃形式當作物神來崇拜，是完全與我們無緣的。爲了奪取政權的一切必需工作，不僅政治上的工作而且組織上的和軍事技術上的工作，都在全速率進行着。但是這一切工作底合法外衣，就是時時提起的目前大會，牠將解決政權問題。我們在全線採取攻勢，却保持着守勢外觀。他方面，臨時政府即使有決心認真自衛的，也就必須攻擊蘇維埃大會，禁止其召集，因之供給反對者方面以武裝暴動的理由，一個最不利於政府的理由。此外，我們不僅置臨時政府於不利的政治局勢而已，我們而且麻痺了牠的本已遲鈍的意識。那些人認真相信我們關心的僅僅是蘇維埃式議會制度，僅僅是一個新大會，這個大會又將通過一個關於政權的議決案，如彼得格拉和莫斯科蘇維埃所已通過了的；他們以爲那時政府將以預備國會和立憲會議爲藉口不理會那個議決案，以此陷我們於可笑的地步。我們有不容否認的克倫斯基底證言，足以證明最聰明的中等階級人物正是朝這方向走的。克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十月二十四日半夜時候，在他的辦公室裏，他和但和其他的人之間如何熱烈辯論武裝暴動問題，——那時暴動已在全力進行中了。克倫斯基寫道：「但宣

言，首先他們得到的消息比我得到的更實在些，而我是在我的「反動的司令部」報告影響之下誇大事變了的。他然後告訴我，共和參議會多數人通過的議決案，如此傷犯「政府自尊心」了的，乃有非常的價值，其用意在於「轉移羣衆情緒」，現在已經「發生效力」了，現在布爾雪維克宣傳影響已經「迅速減退」了。他方面，據他自己說，布爾雪維克派與蘇維埃大多數派領袖談判時候，也已聲明他們決心「服從蘇維埃多數意志」；他們「明天」就要用種種方法去熄滅那違反他們的願望又未經他們的批准而爆發起來的暴動之火的！做結論時，但說起了布爾雪維克派「明天」（總是明天！）將解散他們的軍事指揮機關的，以後他就宣布凡我爲了撲滅暴動而採取的種種步驟祇能「激怒羣衆」罷了，我的干預一般是「妨害了蘇維埃多數派代表們不能有成效地與布爾雪維克派進行談判，去取消暴動。」……正當但通知我這些可注意的消息的時候，武裝隊伍和「赤衛隊」把政府機關一個跟一個佔據去了。但及其同志們出了冬宮之後不久，部長卡塔舍夫在臨時政府開了會回家去時候，走到百萬大街就被人捕去了，直接解往斯摩尼，但正是往那裏去繼續他與布爾雪維克派的和平談判哩。我不得不承認，布爾雪維克派此時的行動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很巧妙。暴動已在全力進行，「赤色隊伍」已在全城各處進攻時候，一些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受了特別委任，設法——並非不成功——使得「革命的民主派」代表們雖視而不見，雖聽而不聞。這些詭詐的人整夜在進行着無窮盡的討論各種公式，作爲妥協和取消暴動的基礎。布爾雪維克派以此「談判」手段贏得不少的時間。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底作戰力量未曾及時動員起來。」（克倫斯基著的「從遠方來」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由上面引的話看來，妥協派確實上了蘇維埃法統底當了。克倫斯基以爲有些布爾雪維克派受了特

別委任拿取消暴動去欺騙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這話却是不確實的。事實上，最積極參加談判的布爾雪維克派，乃是那些真正想取消暴動的人，他們相信了那個由一切黨派妥協而成立的「社會主義政府」的公式。然而，這些談判者客觀上無疑是有功於暴動的，他們以自己的幻想去培養敵人底幻想。但他們的所以能如此有功於革命的，僅僅因為黨不顧他們的獻計和警告，而以不可減弱的毅力去進行暴動到底。

必須有種種特異的——大的和小的——環境相配合，才能保證這個大規模的廣包的計策之成功。首先必須有個軍隊不願再戰爭。我們已經說過，革命底整個行程，從二月到十月，尤其在開始階段，將是完全不同的，倘若爆發革命時候國內並沒有一個幾百萬人的破碎而怨望的農民軍。僅僅這個條件已經足夠拿彼得格拉衛戍軍底經驗做出成功的結論了，這經驗預先決定了十月底勝利。這個「乾燥的」幾乎難以知覺的暴動，其配合於保衛蘇維埃法統以反對哥尼洛夫等人的事情，乃是特別的，絲毫不能定為一種常規。恰好相反，我們可以斷言，這個經驗在他處永不會以此方式重演的。但是仔細研究這個經驗却非常需要。這可以幫助每個革命家擴大眼界，將那能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底繁複性披露於革命家面前，祇消他的心裏永遠明白記住目的，祇消局勢估量得正確而且有決心鬥爭到底的。

在莫斯科，暴動拖延得長久得多，造成的犧牲也多得多。其原因一部分乃在於莫斯科衛戍軍，並未曾像彼得格拉衛戍軍一樣，爲了調往前線問題，經過革命的準備。我們已經說過，我們再說一遍：彼得格拉武裝暴動是分做二次進行的，第一次在十月初當彼得格拉衛戍軍服從蘇維埃那個與他們自己願望完全符合的決議而拒絕實行司令部命令時候，第二次在十月二十五日當發生一次補充性的較小暴

動爲了剪斷二月政權臍帶時候。但在莫斯科，暴動則做一次發生；這也許是拖延長久底主要原因。但還有其他的原因：領導機關是不夠堅決的。在莫斯科，我們看見從軍事行動走到談判，接着又從談判走到軍事行動。領袖底動搖傳給下面信從者，如果在政治上這種動搖一般是有害的，那麼在武裝暴動條件之下就有致命危險。統治階級已經不信任自己力量了（否則暴動一般是沒有勝利希望的），但牠手裏還操縱着機關。革命階級底任務就是奪取國家機關。要做這個，必須信任自己的力量。黨一經領導工人去暴動了，就必須從此做出一切必需的結論。「打仗時候應當打仗」。在戰爭條件底下，動搖和拖延比任何其他時候更加是不可容許的。戰爭底量尺是很短的。凡在原地踏步的，即使僅僅踏步幾小時，也會恢復統治階級一半的信任心，而減少暴動者方面一半的信任心。但這就決定了勢力關係，轉過來又決定了暴動結果。由此觀點出發，我們就必須一步一步在其與政治領導關係上去研究莫斯科軍事行動底經過。

列舉其他若干事例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國內戰爭發生於特殊條件之下，譬如其中含有民族的原素等等。依據於細心消化的事實材料之上作此研究，一定能大大地豐富我們的關於國內戰爭機構的知識，因之幫助我們去歸納出若干方法，規則和計劃，含有一般性質的，因此作爲一種內戰「教科書」。而這種研究，有些部分的結論可以預先提出來說的，就是外省的國內戰爭大大地受彼得格拉勝利所決定，不管莫斯科如何遷延不決的。二月革命損毀了舊的國家機關。臨時政府繼承了這個機關，但既不能更新牠，又不能加強牠。所以從二月至十月之間，國家機關僅以官僚惰性殘存物資格起着作用。外省的官僚機關習慣於做着彼得格拉做過的事情，二月如此，十月亦然。我們準備要推翻的乃是

一個尙來不及鞏固起來的政制，——這一點是我們的很大便宜處。「二月」國家機關之極端不穩定性和無把握性，非常幫助了我們灌輸自信心於革命的羣衆和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以後，德奧二國也存在着類此的狀況。但是在那裏，社會民主黨填補了國家機關底裂縫，而幫助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制，這個政制雖然不能認爲是穩定的，但總已存在六個年頭了。至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相接近，這個便宜處是不會有的。他們的「二月」過去很久了。不錯，英國還有不少的封建殘存物，但一個獨立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絕對談不上的。英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權之後，第一把掃帚就把君主，貴族以及其他，通通掃清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要對付的是一個完全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國家，但這並不是說牠要對付的是一個穩定的國家機關；因爲無產階級暴動底可能性，正是從資本主義國家解體過程非常深刻之中產生出來的。倘若我們國內，「十月」革命是在與一個「二月」以後尙未能穩定下來的國家機關相鬥爭之中開展的，那麼其他國家的暴動就要應付一個在逐漸解體狀態的國家機關了。

如下的話可以定爲普遍的規則（我們早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指出來了），即說：舊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在十月前期的抵抗力量一般比俄國大得多，無產階級更難得獲取勝利，但他方面，奪取政權之後無產階級底地位也將比我們在十月以後時期所處的更鞏固得多的。在我們國內，僅僅當無產階級在幾個主要城市和產業中心奪得政權之後，才發生真正的國內戰爭，而且直延長到蘇維埃統治前三個年頭。有了種種證據，可以說明中歐和西歐諸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更困難些，但一經奪得政權之後行動就更自由了。這些關於前途的診斷自然含有假設性質。一大部分將依賴於歐洲各國革命發生的

順序，依賴於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依賴於當時蘇聯底經濟力和軍事力等等。但無論如何，我們的基本的而且——我們相信——無可辯駁的斷語，——即說：奪取政權底真實過程，在歐洲和美洲，將比在我們國內，遭遇到統治階級方面更認真更頑強和更有準備的抵抗，——更加需要我們將武裝暴動和國內戰爭看作一種藝術了。



再論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在我們國內，無論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都是鬥爭到某一階段從運動本身生長出來的一種自然的組織形式。但是創立不久久的歐洲諸黨，多少將蘇維埃當作「學說」和「原則」來承受的，牠們時刻有將蘇維埃視爲一種物神，視爲革命中一種自足的因素之危險。蘇維埃作爲奪取政權機關，無論具有何等巨大的便宜處，但暴動仍可以依據其他的組織形式之上（如工廠委員會，工會等）開展着的，蘇維埃仍可以直待暴動的時候才發生，甚至暴動勝利以後才發生，作爲國家政權底機關。

從這觀點看來，七月事變之後列寧發動的，反對蘇維埃組織形式拜物教之鬥爭，具有最高的教育意義。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的蘇維埃，七月間既然變成了一種驅遣兵士在前線進攻和壓迫布爾雪維克派的組織，無產階級羣衆底革命運動就必須尋找新的道路了。列寧提出工廠委員會爲奪取政權的組織（見鄂終尼啓宰同志底回憶）。若無哥尼洛夫叛亂迫得妥協派蘇維埃去自衛，又使得布爾雪維克派能夠灌注革命新力於蘇維埃之中，而經過其左翼即布爾雪維克翼將蘇維埃同羣衆密切聯繫起來，——那麼運動多半要沿着工廠委員會路線進展的。

從最近德國經驗看來，這個問題含有巨大的國際意義。德國會有好幾次設立了蘇維埃作爲暴動機關，而當時並沒有暴動；又作爲政權機關，而當時亦沒有政權。結果成了如下狀況：一九二三年，廣

大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底運動開始圍繞着工廠委員會團結起來了，工廠委員會大體上執行着我們的蘇維埃在直接奪取政權前期所執行的一切職務。一九二三年八月和九月，好多同志便提議我們要立即進行在德國設立蘇維埃。經過了長久而熱烈的辯論，這個提議被拒絕了，而且拒絕得很對。工廠委員會既然在行動上成了革命羣衆的團結中心，則在準備階段蘇維埃就變爲平行的組織形式，毫無真實內容了。蘇維埃祇能使人分心，不去注意暴動底物質任務（如軍隊，警察，武裝百人團，鐵路等等）。而注意於一種自足的組織形式。他方面，在暴動以前而又離開直接的暴動任務去設立蘇維埃，那就等於公開宣布：「我們要進攻你！」工廠委員會成了廣大羣衆團結中心之後，政府不能不「寬容」牠，但政府一開始就要打擊蘇維埃的，認爲這是「企圖」奪取政權的正式機關。共產黨人不得不出來保衛蘇維埃，這純粹的組織形式。決勝負鬥爭不是爲了奪取或保衛什麼物質陣地而爆發的，也不是在我們選取的時期爆發的，——不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即暴動從羣衆運動條件生長出來。不，鬥爭是在蘇維埃「旗幟」底下，於敵人選取的時期爆發起來，迫得我們不得不應付的。當時也十分明白，整個的準備暴動工作是在工廠委員會權威底下實行成功的，工廠委員會已經成了羣衆組織，而且數目和力量方面都在不斷地增長；這本可以讓黨在確定暴動日期方面自由地活動。到了一定階段，蘇維埃自然要發生起來的。在上述條件之下，蘇維埃能否作爲直接的暴動機關在衝突火燄中發生起來，是很可置疑的，因爲那時將冒着於最緊急時機設立二個革命中心之危險。英國一句俗語說：過河時候切勿換馬。國中幾個重要地方勝利之後，蘇維埃就可以處處設立起來的。總之，一個勝利的暴動必然要去設立蘇維埃作爲國家政權機關。

不要忘記了，在我們國內，蘇維埃是發生於革命底『民主』階段，在那階段成了合法組織，以後爲我們繼承下來受我們使用。這種情形，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將不會重演。那裏，在大多數情形之下，蘇維埃將應共產黨人號召而設立起來；因之將作爲無產階級暴動底直接機關。自然，這並不排除那種情形，即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底解體未至無產階級能奪取政權時候，就達到十分劇烈地步了，以此造成了條件，使得蘇維埃成立起來，作爲準備暴動的公開機關。但這多半不能成爲一般的法則。最可能的情形，乃是蘇維埃須待最後幾日才創立起來，作爲暴動的羣衆底直接機關。最後，這種情形也會發生的，就是有種局勢使得蘇維埃祇能設立於暴動已經過了最高點時候，或甚至臨結束時候，作爲新政权底機關。所有這些可能情況，必須記在心頭，免得我們陷於組織上的拜物教，免得蘇維埃從鬥爭底靈活而生動的形式變爲加於運動之上的一種外來組織『原則』而攪擾了運動底常態發展。

近來，我們的出版物中有人說道：我們沒有資格預言無產階級革命將經過什麼孔道發生於英國。是經過共產黨呢，還是經過工會呢？如此提出問題，表示一種假寬闊的歷史遠景；這是非常之錯誤而危險的，因爲抹煞了最近幾年的主要教訓。戰爭終了時沒有勝利的革命發生，那是因爲缺乏一個黨。這個結論可以通用於全體歐洲。至於各國革命運動命運也可以具體追溯的。拿德國來說，情形是很明白的。若有一個合宜的黨來領導，則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德國革命都可勝利。一九一七年芬蘭情形也是如此。那裏，革命運動在特別有利的條件底下發展，又有革命的俄國來扶持和直接軍事援助。但是芬蘭黨領袖大多數表現自己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葬送了革命，匈牙利的經驗也給人同樣的教訓。那裏，共產黨人和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並非奪得政權，而是受了驚嚇的資產階級把政權交付他們。

匈牙利革命沒有鬥爭沒有勝利就成功了，一開始也就沒有一個能夠戰鬥的領導機關。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由此表明牠本身就不是共產黨；因此，不管匈牙利工人如何有戰鬥精神，牠仍不能保持那如此輕易得到的政權。沒有黨，離開黨，越過黨頭上，或拿別的東西代替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勝利的。這是最近十年底主要教訓。不錯，英國工會可以變成無產階級革命一枝有力的槓杆，譬如在一種條件之下於某個時期中甚至可以代替蘇維埃。然而英國工會要履行這個職務，便不能離開共產黨，尤其不能反對共產黨，祇能使共產黨底影響成爲工會內有決定性的影響。爲了這個結論，——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和重要，——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多了，絕不肯輕易拋棄牠或減輕牠的意義。

自覺，熟慮和計劃，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佔的地位，比在無產階級革命中佔的地位要小得多了。在資產階級革命中，革命動力也是由羣衆供給的，但那時羣衆沒有現在的有組織和有自覺。領導權操在各部分資產階級之手，他們操有財富，教育，及與之有關的一切組織上利便處（城市，大學，出版物等）。官僚的君主制之自衛是臨時應付的，是暗中試驗然後行動的。資產階級有可能等待，以便抓住適宜的時機，因爲牠能利用下層階級底運動，而以其全部社會力量投入之，如此奪得政權。無產階級革命與之不同的恰在於：無產階級以其前鋒隊爲代表，在這革命中不僅是主要的進攻力量，而且是領導力量。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經濟，教育，市政，大學等的作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祇能拿無產階級黨來代替了。爲了敵人也更有自覺原故，黨底作用也就更重要了。資產階級，在其幾百年統治當中，受過的政治訓練比舊時官僚君主制度的訓練好得多了。如果在相當限度之下，議會制度可以替無產階級做訓練革命的學校，那麼這個制度更加可以替資產階級做訓練反革命戰畧的學校了。祇消指

出一點就夠了，即是資產階級利用議會制度爲手段，居然教育了社會民主黨，使之今日成了私產制的主要支柱。歐洲社會革命時代，從其最初幾步看來，將不僅是一個緊張而殘酷的鬥爭時代，而且是一個深謀熟慮的鬥爭時代，——比我們一九一七年時更有謀劃些。

所以我們需要與現時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態度，去對待一般的國內戰爭問題，及特殊的武裝暴動問題。我們大家都跟着列寧反覆述說馬克思底話：暴動是藝術。但是倘若沒有根據最近幾年積聚下來的廣大經驗而補充以關於內戰藝術的根本要素的研究，則馬克思這句話就變爲一句空話了。必須坦白地說，凡對武裝暴動問題採取輕忽態度的，都是表示尙未克服民主黨底傳統力量。一個黨，若是忽視了內戰問題，而希望一切事情到了緊急關頭自然會解決，那牠是一定要破產的。我們必須以集體的方式分析一九一七年以來無產階級鬥爭經驗。

上面畧述一九一七年黨內派別關係史，也是內戰經驗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我們相信，對於全部共產國際政策也有直接意義的。我們已經說過，我們再說一遍：研究黨內意見衝突，無論如何，不能也不可視爲攻擊那些進行錯誤政策的同志。但他方面，祇因爲有些同志未能與無產階級革命齊一步驟，遂把我們黨史中最重要的一章抹煞了，——這也是絕對不可容許的。黨必須知道全部過去，才能正確判斷過去，並安置每個事變於牠的適宜的位置。一個革命黨底傳統不是建立在粉飾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批評的明確性之上的。

歷史給了我們的黨以無可估價的革命便宜。反對帝制的英勇的鬥爭傳統，革命的自我犧牲習慣，同秘密活動傳統聯繫起來；廣泛的理論研究和吸收人類革命經驗；反對門雪維克主義，民粹主義和妥

協主義的鬥爭；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最高經驗；反動幾年間理論研究和吸收這個經驗；根據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教訓檢查國際勞動問題等等，——所有這些，總括起來，給了我們的黨以非凡的革命韌性，以最大的理論深入，以無比的革命勢力。雖然如此，但在這個黨內，在黨上層裏面，臨到決勝負行動時候，仍舊形成了一羣有經驗的革命家，老布爾雪維克派，激烈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這一段危急的革命時期中，對於一切根本問題採取了本質上屬於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必須有個列寧，而且列寧在黨內那時也必須有空前的特殊影響，才能保全黨和革命免受此局勢造成的最大混亂所損害。倘若我們希望其他國家共產黨從我們學了什麼東西去，那麼上面這一點是絕不可忘記的。選擇領導機關的問題，對於西歐各黨特別有重要意義。流產的德國十月之經驗是明顯的證據。但是選擇領導機關必須在革命行動照耀之下進行的。在那幾年中，德國已供給豐富的機會，於直接鬥爭時候考驗黨底領導分子。若無這個考驗標準，其餘都是沒有價值的。法國在那幾年中革命運動比較貧乏些，連部分的運動也不多見。但即使在法國政治生活中，我們也看得見國內戰爭底閃光，也有些頃刻為黨中央委員會和工會領導機關所必須以行動應付那些不可延緩的和尖銳的問題的（譬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流血的集會）。仔細研究這類尖銳性的事件，將供給一些不可代替的材料，以估計黨底領導機關，黨的各種機關，以及各個領導分子。漠視這些教訓，不從這些教訓做出必然的結論來，以選擇負責的人，——那就等於招致那不可避免的失敗。因為黨若無銳利的堅決的和勇敢的領導機關，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每個黨，即使是最革命的黨罷，也必不可免地產生其自己的組織上保守性；否則黨就缺少必需的

穩定性了。這完全是屬於程度深淺的問題。一個革命黨內，爲生存上所必需的保守性成分，必須配合以完全不爲陳文舊規所束縛的自由精神，以決定方向上的創意力和行動上的大胆。這些品性到了歷史轉灣點時候要受最嚴格試驗的。我們已經引過列寧底話了，即是說：甚至最革命的黨，到了局勢急劇轉變而新任務因之發生出來的時候，往往仍在進行昨日的政治路線，以此變成了革命發展底制動機或有變成此制動機之危險。保守性和革命創意力，二者在黨領導機關表現得最濃烈的。歐洲諸國共產黨正等待着最急劇的「轉灣點」，——即從準備工作轉到實際的奪取政權去。這個轉灣是最危急的，最不可延緩的，最要負責任的，最可怕的。錯過了轉灣時機，就是招致黨所遭遇的最大失敗。

歐洲鬥爭底經驗，尤其德國鬥爭底經驗，若是拿我們自己的經驗照耀來看，就可以告訴我們說：有二種典型的領袖，每逢必須向前大跳一步時候，都是傾向於把黨拖向後退的。這些領袖之中有一部分人一般傾向於在革命道路上首先看見困難和障礙，而且用一種先定的雖然並非常自覺的避免行動意向，去估量一切局勢。在他們手裏，馬克思主義變成了說明革命行動不可能性之方法。這個類型人物之最純粹的標本，就是俄國門雪維克派。但是這個類型並不限於門雪維克主義，牠在最危急的時候忽然也出現於革命的黨底負責任機關。第二種類型人物底代表則以其皮相的和鼓動性的態度爲特徵。他們不見有何障礙或困難，直至於他們額頭碰到障礙或困難時候。以誇大言辭來克服真實障礙之能力，以崇高的樂觀主義表現於一切問題之傾向（「大洋不過深及膝」），一到決勝負行動時候，就要不可避免地變爲正相反面的了。第一類型的革命家把小丘視爲大山；對於他們，奪取政權上的困難乃是他們習見的困難之累積和倍增的。至於第二類型人物，即那些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則革命行動底困難

總是被視爲意外突現的。在準備時代，這二種類型人物行動是兩樣的；前者是懷疑家，不很可靠，即是在革命意義說來不很可靠；後者則似乎是熱狂的革命家，但是到了決勝負頃刻，這二類型人物就携手同行；他們都是反對暴動的。整個準備的工作，其價值僅僅在於培養黨尤其領導機關能決定暴動時機而領導之而已。因爲共產黨底任務正在於：爲了改造社會而奪取政權。

近來好多人說了話和寫了文，主張共產國際有「布爾雪維克化」之必要。這個任務是不能辯駁的，也不能延緩的；經過去年德保二國嚴酷的教訓之後，這個任務更加是迫切的了。布爾雪維克主義並不是一種學說（即是說不僅是一種學說），而是以革命手段訓練無產階級暴動的一個系統。各國共產黨之布爾雪維克化究竟表示什麼意思呢？就是給各國黨以這樣一種訓練，以這樣一種選擇領袖標準，免得到了各自的十月時候，黨又退縮了。「全部黑格兒就在這裏，書籍底智慧就在這裏，一切哲學底意義就在這裏……」

關於本卷的簡單聲明

「民主」革命底最初階段，起於二月革命迄於四月危機及其解決（五月六日，合作政府成立，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之參加政府）。在這最初階段，著者本人尙未直接參加革命，我於五月五日才回到彼得格拉，合作政府即於次日成立。這第一階段及其革命的遠景，我在美國時曾寫了幾篇文章討論過。照我的意見，這幾篇文章，在一切根本點上，是完全符合於列寧在他的遠方來信之中對於革命的分析的。

從我回到彼得格拉之第一日起，我的工作完全與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配合着進行。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路線，無論全體或部分，自然我都贊成。說到農民方面，列寧和我之間一毫分歧意見都沒有。此時，列寧正在與布爾雪維克右派及其「工農民主專政」口號鬥爭，已經完成鬥爭第一階段了。我尙未正式入黨以前，就參加起草好多議決案和文件，以黨名義發出去的。我所以再延遲三個月才正式入黨，唯一的顧慮乃在於催促「區際組織」和一般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當中最優秀分子與布爾雪維克派合併。我之實行這個政策也是完全得到列寧同意的。

本卷全集編輯者，叫我注意如下的事實，即是我那時寫的贊成統一的論文之中，有一篇說起了布爾雪維克派組織上「閉關主義」的話。有些好吹求的人，譬如索林同志，自然要忙着從當初關於「第一條黨章」的爭論，直接推演這句話出來。我認爲沒有必要在這方面繼續辯論，尤其因爲我在言與行

兩方面都承認過我的真實而重大的組織上錯誤了。但少懷成見的讀者，對於上引那句話將會發現一個較簡單較直接的解釋的。這話是爲了應付當時的具體條件。區際派工人之中，當時對於布爾雪維克派彼得格拉委員會底組織政策，還是非常不信任的。「閉關主義」的議論，在區際派之中很流行。我以如下方式反駁這種議論，我說：閉關主義，作爲過去一種遺產來說，確是存在的，但若必須減少這閉關主義的話，則區際派自己就應當解散其獨立的組織。

我向第一次蘇維埃大會提議成立一個由十二個貝顯洪諾夫組織成的政府，這個「提議」本是純粹論戰性的，却被某人——我記得是蘇漢諾夫——解釋爲我個人傾向於貝顯洪諾夫或我提出一個特別的政治路線，與列寧底不同。這自然是純粹胡說。我們的黨既然要求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蘇維埃應當拿取政權，那就等於「要求」一個由若干貝顯諾洪夫組成的政府了。最後分析起來，貝顯洪諾夫，欠爾諾夫和但之間並無原則上的差別。在促進資產階級政權轉移給無產階級這一點上，他們都是同樣有用的。貝顯洪諾夫本人也許多懂得一點統計學，也許以實際家資格，比較崔勒脫里或欠爾諾夫給人比較好的印象。一打貝顯洪諾夫，這是表示一個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十二個健全的代表組成的政府來代替合作政府，我們的黨領導的彼得格拉羣衆提出了「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口號時候，他們就是要求這十個部長位置應當讓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去填補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先生們，把那些立憲民主黨人踢出去罷！把政權拿在你們自己手裏罷！把十二個（多少隨你們的意）貝顯洪諾夫安置在政府裏面罷！——我們答應你們，將來到了時候，我們要儘可能「和平地」罷免你們的，——這時候不久就要到了！」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路線，——這是列寧三番四次提出來的同一

的政治路線。

我認爲必須注意本卷編輯者倫茨納同志所提出的警告。他指出，本卷搜集的演說，大部分並非從速記上錄下來的，連不完全的速記也沒有，而是從妥協派報紙訪員所記載的轉錄來的，這些訪員一半是無知的，一半是惡意的。我大畧翻閱這一類文件之後，便把原定的校訂和補充的計劃拋棄了。讓這些文件照原來的形式印進去罷，在那種形式之下，這些文件也是屬於時代的文件，雖然是一出於其他方面」。

若無倫茨納同志及其助手赫勒同志，克里贊諾夫斯基同志，羅文斯基同志和魯默同志等細心而合格的工作，這卷全集是不會出版的。倫茨納同志也負責書中的註釋工作。

趁着這個機會，我向他們表示我的同志情誼的謝意。我也要特別指出我的最親密合作者格拉茲曼同志在準備這卷書上，以及準備我的其他著作上所做的巨大工作。我結束這幾行時，含着最深刻的悲哀，想起了這位光耀的同志，工人，人底非常悲慘的死。（註一）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於啓斯洛伏茲克

（註一）**格茲曼拉**（M. S. Glazman）之死 格茲拉曼爲了一種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出黨，

以後就自殺了。

附錄

三種俄國革命觀（註一）

一九〇五年革命，不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底「預演」，而且是一種工場，其中製定了俄國政治生活內所有基本的派別，又產生了俄國馬克思主義內各種不同的傾向。爭論之焦點，不待說，是關於俄國革命底歷史性質及其未來發展道路問題。這種對於革命觀的爭論，與史大林傳記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史大林並未獨立地參加。他寫的幾篇與此問題有關的宣傳文章，是完全沒有理論價值的。好多布爾雪維克派，執筆為文將那些思想通俗化的，都比史大林寫得好些，而且好得多。敘述和批評布爾雪維克派底革命觀，自然是屬於列寧傳記內的事情。但是理論也有其自己的命運。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後的時代，直至一九二三年為止，當各種革命觀都製定而且應用出來的時候，史大林是沒有什麼獨立立場的，可是一九二四年忽然發生了一種變化，開啓了一個官僚反動和重估過去價值的時代。革命影片顛倒放映，舊時的各種革命觀被人拿出來作新的估價或加以新的解釋。於是，出乎意外地，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斷革命論」上面，視之為「托洛次基主義」一切「謬論」之源泉了。自此以後好多年中，對於「不斷革命論」的批評，遂成爲史大林及其夥伴們所有理論（恕我濫用這個字眼）著作之

主要內容了。既然，在理論方面，「史大林主義」底每一成分都是從「不斷革命論」（如一九〇五年提出的）批評出來的，那麼敘述這個理論，說明牠與門雪維克派和布爾維雪克派兩種理論之差異，顯然也是本書分內事情了，至少也當在本書附錄中敘述了。

俄國底發展，首先顯出來的，是牠的落後性。但歷史的落後並非表示這個國家將依樣葫蘆於一百年或二百年後重走着諸先進國所已走過的路徑之意。寧可說這個國家有完全不同地「配合的」社會形態，其中資本主義技術和結構上最高的成就，進入於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蠻的社會關係之內，改變這些關係，支配這些關係，造成一種特異的階級對比。在思想方面說來，也是這樣。正因為牠的歷史的落後性，俄國才能成爲歐洲唯一的國家，尙未行過資產階級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社會民主政黨就發展爲一種大力量，——當然是這樣的，因爲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二者間相互關係的問題，惟有在俄國得到最深刻的理論的檢討。

理想主義的民主派（大多數是民粹派），很迷信地不肯承認：即將到來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他們稱之爲「民主的」革命，圖謀拿這中性的政治商標來掩飾革命底社會內容，不僅爲了欺騙別人，而且爲了欺騙自己。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始祖蒲列漢諾夫，遠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他反對民粹派時候，就已證明俄國不能挑選自己愛走的發展道路了。同其他國家一般，俄國也須經過資本主義煉獄。在這條道路上，俄國可以爭得政治自由，就是無產階級繼續爲社會主義鬥爭時所不可缺少的。蒲列漢諾夫不僅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開，視前者爲目前的任務，視後者爲未來的遠景，他而且

規定了兩種革命中各自不同的力量配合。無產階級先與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去爭取政治自由；然後，經過幾十年後，在資本主義發展底高平面上，再與資產階級直接衝突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〇四年末，列寧寫道：「俄國智識分子……始終認爲，把我們的革命定爲資產階級的，就等於使牠黯然無色，使牠受委屈，使牠變庸俗。……爲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獲得政治自由和建立民主共和國而鬥爭，在無產階級看來，這不過是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一個必須經過的中間階段罷了。」一九〇五年他又寫道：「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確信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這話怎講呢？這話就是說，俄國不能缺少的那些民主改革，其本身不僅不會破壞資本主義，不會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反而要首先真正清除道路，讓資本主義能普及而迅速發展起來，不是亞洲式的發展，而是歐洲式的發展；反而要首先致使資產階級能以階級資格建立其統治權。……」他堅持說：「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框殼之外去，但我們可以好好地擴大這個框殼。」——這話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面創立一些條件，更有利於無產階級往後鬥爭的。在這範圍內，列寧還是跟在蒲列漢諾夫後面亦步亦趨的，革命底資產階級性，——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大派路線底交叉點。

在此情形下，史大林宣傳時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爲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共同遺產的通俗公式之範圍以外去的。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間寫道：「在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基礎上選出的立憲會議，正是我們現在努力爭取的！惟有這種立憲會議才能給我們民主共和國，這是我們爲社會主義鬥爭時所極端需要的。」拿資產階級共和國做戰場，以繼續階級鬥爭，爲了爭取社會主義目的，——這就是革命前途。一九〇七年，即當國外和彼得堡出版物已經多次爭論，而第一次革命又嚴

格考驗了理論診斷之後，史大林寫道：「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必須以打破農奴制度爲止而非以打破資本主義制度爲止，革命結果祇能成立民主共和國，——這幾點，似乎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同意的。」這裏，史大林並非說革命當以什麼開始的，却是說革命當以什麼告終的！他預先把革命限制於「祇能成立民主共和國」，而且說得很堅決。我們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在他那時寫的文字中找到一絲一毫暗示，關於那與民主革命有聯繫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途。他這個立場一直保持着，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初期，到列寧回至彼得格拉時候。

在蒲列漢諾夫，阿克塞洛德，及一般門雪維克派領袖看來，把革命定爲資產階級性質，首先含有一種政治意義，即避免未成熟地拿社會主義這個紅色幽靈打攪資產階級，把資產階級「嚇跑」，走入反動營壘去。門雪維克派主要的策畧家阿克塞洛德在統一大會（註二）上說道：「俄國社會關係僅僅成熟到可以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現在這種無法無天的政治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的時候，我們甚至不應當說起什麼無產階級爲政權直接鬥爭以反對其他階級一類的話。……無產階級是爲了資產階級發展條件而鬥爭的。客觀的歷史條件註定我們的無產階級非與資產階級合作以反對共同敵人不可。」如此說來，俄國革命底內容就預先限制於能符合自由派與資產階級利益和觀點的那些改革了。

這就是兩大派根本分歧之出發點。布爾雪維克派堅決否認俄國資產階級能完成牠自己的革命。列寧比蒲列漢諾夫更有力更徹底提出了土地問題作爲俄國民主革命底中心任務：「俄國革命底癥結乃是土地問題。……革命勝敗繫於羣衆爲土地鬥爭的條件。」列寧同蒲列漢諾夫一樣，將農民看做小資產

階級，將農民底土地政綱看做資產階級進步政綱。他在統一大會上說道：「土地收歸國有，乃是一種資產階級手段。土地國有將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因為牠將激勵階級鬥爭，將加強土地流動和農業投資，將降低穀物價格。」土地革命雖然含有資產階級性質，但俄國資產階級是反對沒收貴族地主所有土地的，正是爲了這個原故，俄國資產階級才努力圖謀在普魯士式憲法基礎之上與君主制度妥協。列寧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觀念，去對抗蒲列漢諾夫所提的無產階級和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觀念。他宣布，這兩個階級革命合作之任務，乃是要建立一種「民主專政」，作爲唯一的手段，來徹底肅清俄國底封建殘餘，來創立一種自由農民階級，來開闢美國式的而非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列寧寫道：革命底勝利，「祇能經過專政道路達到，因為無產階級和農民所立即需要的那些改革，如果實行起來，必然會惹起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帝制方面極頑強的抵抗。不用專政手段，是不能打破這種抵抗的，是不能擊敗反革命努力的。不待說，這種專政並非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的專政。牠並不能剷除資本主義根基（若非在革命發展中經過一連串的中間階段）。牠至多能夠：徹底重分土地所有權，爲了農民利益；實行徹底而完全的民主化，連共和國在內；剷除工廠和農村生活中一切亞洲式的壓迫制；開始實施工人條件上重大的改善；提高工人生活水準；最後，燃起歐洲革命大火。」

列寧底革命觀的確是大大地前進了一步，牠是從土地革命中心任務這一點出發的，而非從憲法改革爲革命中心任務那一點出發的；牠又指示那唯一能實現此任務的社會力量配合方式。這個革命觀底弱點乃在於「工農民主專政」這個觀念中含有內在的矛盾。列寧公開稱這個專政爲「資產階級的」時

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這個專政底基本限制性。他以此暗示：爲了維持與農民的聯合，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不可直接提出社會主義任務。但如此一來，無產階級不啻是放棄「牠自己的」專政了。所以列寧那個專政，本質上是農民底專政，雖然有工人參加在內。有幾次，列寧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例如在斯托克霍姆大會上，當蒲列漢諾夫反對奪取政權「空想」時候，列寧就回答他道：「我們說的是什麼綱領呢？是土地革命綱領。這個綱領設想誰來奪取政權呢？是革命的農民。難道列寧把無產階級政府和農民政府混爲一談了麼？」沒有！他提起他自己說：列寧分別得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府和什麼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農民政府。他又反問道：「若非革命的農民奪取政權，怎能有個勝利的農民革命呢？」在這論戰式的說明中，列寧很明白暴露了他的立場底弱點。

農民是分散在廣闊的面內，而以諸城市爲其接觸點的。農民自身甚至不能提出他們的利益，因爲在不同的區域，農民所想的利益是不相同的。諸行省間經濟的接觸是經過市場和鐵路的，但市場和鐵路都是操在城市手裏。農民要超出鄉村界限以外來爭取他們的利益，就必須政治上依賴於城市。農民在其社會關係上是不單純的；富農自然努力誘導農民去同城市資產階級聯合，而下層農民則傾向於城市無產階級。在此情形之下，農民，就其全體來說，是不能負擔政治大權的。

不錯，在古時中國，屢次革命會推送農民走上政權，或寧可說是推送農民暴動底軍事領袖去當政。革命結果常常實行重分土地，而且建立一個新的「農民」皇朝，以後歷史又開始那一套了：土地又集中起來，又造成一批貴族，又出現高利貸，又發生農民暴動。祇要革命保持其純粹的農民性質，社會是不能走出這沒有出路的循環圈之外的。這便是古代亞洲歷史（古代俄國歷史也在其內）之基

礎。在歐洲，則從脫離中古時代起，每次勝利的農民暴動都未曾建立一個農民政權，都祇讓市民階級之左派去當政。恰切點說，農民暴動勝利之處，不過是建立城市人民中革命部分之政權罷了。在二十世紀資產階級的俄國，革命農民之奪取政權是談不上的。

對於自由派資產階級之態度，這樣便成了社會民主黨中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分歧之準繩了。俄國革命能夠進行多遠，未來臨時革命政府具有什麼性質，牠能遭遇什麼任務，牠將依照什麼次序來解決那些任務，——這一切的問題，必須同無產階級政策底基本性質聯繫起來，才能正確而重要地提出的；而此基本性質首先決定於無產階級對於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蒲列漢諾夫固執地閉起眼睛，不理會十九世紀政治史上這個基本的教訓，即是說：凡無產階級成爲獨立力量出現之處，資產階級就要走進反革命營壘去的。羣衆鬥爭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變爲反動派。至今還沒有人能發明一種什麼辦法來抹煞階級鬥爭法則之作用。

蒲列漢諾夫在第一次革命期間反覆地說：「我們必須重視那些非無產階級黨派之贊助，我們不可用魯莽的行爲驅逐那些黨派離開我們。」這位馬克思主義的哲人便以此類單調的說教來證明：他簡直不懂得社會底活生生的動態。「魯莽行爲」可以趕走一兩個容易動感情的智識分子，但階級和黨派底結合或分離是全憑各自的社會利益的。列寧反駁蒲列漢諾夫道：「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說，自由派地主們能夠寬恕幾百萬次的「魯莽行爲」，却永遠不能寬恕你教唆人家奪取他們的土地。」不懂地主而已，那些上層資產階級，因財產原故，尤其因銀行借貸原故，與地主有關聯的，以及那些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上層智識分子，物質精神雙方都依賴於大的中的財產主人的，——他們也都害怕羣衆底獨立運

動。可是，要推翻俄國帝制，就必須喚起百千萬被壓迫者去從事英勇的，犧牲的，冒險的，至高的革命進攻；而羣衆祇能在他們自己利益的旗幟之下被喚起來鬥爭的，即祇能在那對於剝削階級，尤其對於地主的不可和解的仇恨精神中被喚起來鬥爭的。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反對派之離開革命的工農，乃是出於革命底內在法則自身，是不能靠「謹慎」或外交來改變的。

一月比一月更加證明了列寧對於自由派估量的正確。無論門雪維克派如何希望，俄國立憲民主黨人不僅沒有來領導「資產階級的」革命，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認為他們的歷史使命正在於反對這個革命。十二月暴動慘敗以後，那些利用蜉蝣式國會（註三）而走到政治舞台前面來的自由派，都在盡其全力向帝制政府抱歉，說他們於一九〇五年秋天，當最神聖的「文明」支柱陷於危險時，未能充分努力做反革命活動。自由派領袖米留可夫，曾與冬宮秘密談判的，在報紙上說得很好，他說：在一九〇五年底，立憲民主黨人簡直不能在羣衆面前現身。他寫道：「人們責備立憲民主黨人，說他們當時沒有召集羣衆會議來反對托洛次基主義底革命幻想，……可是人們簡單不懂得或不記得當時參加這類會議的民主羣衆中間流行的情緒。」這位自由派領袖所說的「托洛次基主義幻想」，就是指無產階級獨立政策而言的，這政策引起了城市下層階級，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者對於蘇維埃的擁護，以此趕走了那些「上流社會」。門雪維克派沿着與自由派平行的路線走去。他們時常向自由派抱歉，說他們不該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後仍和托洛次基在一起。門雪維克派那位有才幹的政論家馬爾托夫用如下理由解釋這種錯誤，他說：當時不能不對羣衆底「革命幻想」讓步。

在魯弗里斯（註四）政治派別也是依照彼得堡同樣的原則基礎形成起來的。高加索門雪維克派領袖約丹尼亞寫道：「打敗反動和獲得憲法，——這些目的，將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力量和統一領導而達到。……不錯，農民也將參加這個運動，也將賦予這個運動以一種自然力性質，但發生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述那兩階級，農民運動則是注水於那兩階級磨輪之上罷了。」列寧嘲笑約丹尼亞底杞憂，即約丹尼亞認為，若對資產階級採取一種不可和解的政策，工人就會陷於無助狀態的。列寧說：約丹尼亞「討論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於孤立的問題，可是他忘記了……農民！他承認紳董會（註五）中的地主可以做無產階級底盟友，但不承認農民有此資格，他還是在高加索說這話哩！」列寧這個反駁，本質上是對的，但有一點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約丹尼亞並未會「忘記了」農民；而且，如列寧自己所暗示的，他在高加索也不會忘記農民，因為，那裏，在門雪維克派旗幟之下，農民正像風暴一般起來。但約丹尼亞並非把農民看做政治的盟友，他是把農民看做一種政治上的進攻武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聯盟時候可以而且應當利用這個武器。他並不相信，農民能成爲革命底一種領導力量，甚至一種獨立力量。在這點上，他並沒有錯。但他同時也不相信無產階級能以領導者資格保障農民暴動底勝利。這點就是他的致命的錯誤。門雪維克派底勞資聯合觀念，事實上就是叫工人和農民服從自由派，這個觀念底反動的空想性，是從下一事實出來的，即階級分化如此之深刻，一開始就癱瘓了資產階級，使之不能成爲革命因素了。在這根本問題上，布爾雪維克派是對的：凡要與自由派資產階級聯盟的，必然要把社會民主黨推入那反對工農革命運動的營壘去，在一九〇五年，門雪維克派還沒有勇氣，從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觀做出一切必需的結論。在一九一七年，他們就發揮他們的觀

念到底了，於是他們跌斷了頸項。

在那對於自由派態度問題上，第一次革命那幾年間，史大林是站在列寧方面的。但必須聲明一點，即在此期間，談到反對派資產階級問題時候，甚至門雪維克派下層分子大多數人也是多接近於列寧而少接近於蒲列漢諾夫的。對於自由派的輕蔑，本是智識分子急進主義之文學的傳統。但若我們要探究一下史大林對於這問題有什麼獨立的貢獻，例如分析高加索社會條件，或提出新的論據，或給予舊論據以一種新的說法，——那是完全徒勞無功的。高加索門雪維克派的領袖約丹尼亞，對於蒲列漢諾夫的獨立性，比較史大林對於列寧的獨立性，要大得多了。當流血的星期日（註六）之後，史大林寫道：「自由派先生們要救護那搖搖欲倒的皇帝，是徒勞無功的。他們要給皇帝以援手，是徒勞無功的。……騷動起來的羣衆已經決心革命了，決不肯同帝制妥協的。……不錯，紳士們，你們的努力是徒然的！俄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日出是不可避免的一般。你能阻止日出麼？——問題就在這裏！」諸如此類的話。史大林不能飛得比這更高些。二年半之後，幾乎每字都重覆列寧底話，史大林寫道：「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牠不能推動革命前進，牠更加不能領導革命，牠是革命底不共戴天仇人，必須進行頑強的鬥爭反對牠。」然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上，以後十年內，史大林經過了一次完全的轉變，以致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發生時，他竟贊成與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與此對應，他又主張同門雪維克派混合爲一黨。須待列寧從外國回來，才能結束史大林這個獨立政策，——列寧稱之爲「同馬克思主義開玩笑」。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農民都做簡單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同等地贊成社會主義的；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則農民乃是小資產階級分子，農民必須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停止其為農民，才能成爲社會主義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認爲上述那種社會學的解釋乃是對於農民的一種刻薄的侮辱。俄國各派革命者，曾在這問題上互相鬥爭至兩輩代長久。爲了瞭解後來史大林主義和托洛次基主義之間的衝突，我們必須指出下面的事實，即：符合於全部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從來未曾把農民看做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盟友；恰好相反，正因爲農民佔據壓倒的多數，列寧才斷言俄國是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他的所有論文，凡直接或間接與土地問題有關的，都發揮了這個觀念。

一九〇五年九月間，列寧寫道：「農民運動，在其是革命的和民主的限度內，我們就擁護牠；牠若表現爲反動的，反無產階級的運動，我們就反對牠，我們立即準備着去反對牠。馬克思主義全部精華就包含在這雙重任務裏面。……」列寧把西方無產階級看做社會主義盟友，在某種限度下也把俄國鄉村中半無產階級分子看做社會主義盟友，但牠從來未曾把全體農民看做社會主義盟友。他以他特有的固執反覆地說：「起初，我們用一切手段，連沒收土地在內，擁護一般的農民去反對地主；但以後（還不僅以後哩，且要同時），我們則擁護無產階級去反對一般的農民。」

一九〇六年三月間，他又寫道：「農民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得到勝利，因之將完全耗竭其農民的革命性。無產階級亦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得到勝利，因之將開始真正發揮其社會主義的革命性。」同年五月間，他重覆道：「農民運動乃是別階級底運動，這運動並非反對資本主義根基，而是替資本主義清除一切農奴制殘餘。」我們可以從列寧這篇文章到那篇文章，這年著作到那年著作，這本全集到那本全集，發現這個觀念底踪跡。文句和例證是常常改變的，但基本的思想則是固定不變。

這基本的思想也不能改變。列寧若把農民看做社會主義底盟友，他就毫無根據堅持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而將革命限制於「工農民主專政」，限制於純粹的民主任務了。有時列寧責我「過低估量」農民，但此時列寧底意思並不是責我沒有認識農民底社會主義傾向，而是責我沒有充分（就列寧底觀點說）認識：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獨立性，農民有建立其自己政權的能力，以及經過其政權又有阻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能力。

這個問題底重新估價，是到了熱月反動（註七）期間才開始的；這反動大體開始於列寧患病和逝世時候。從此以後，俄國工農聯盟就被人宣布為本身含有充分的保證，足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危險，亦足以達到蘇聯境內社會主義完成了。史大林拿「一國社會主義論」來代替「世界革命論」之後，就把馬克思主義對於農民的估價稱為「托洛次基主義錯誤」，不僅就現在說哩，而且追溯到全部過去時代。

當然，我們可以提出疑問；即說：馬克思主義對於農民的那種古典的估價，是否被事實證明為錯誤了呢？但這個問題將引導我們超出此附錄範圍以外去。暫時，我們說下面一點就夠了，即：馬克思主義把農民估量為非社會主義的階級時候，從來未曾賦予這估價以一種絕對的不可更改的性質。馬克思好久以前就說：農民有判斷能力，也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農民底本性是隨條件不同而改變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發現有很大的可能性，去影響農民，去重新教育農民。歷史尚未曾探出這個可能性底限度。然而我們已經明白了，蘇聯國家強制作用之日益增大，不僅沒有駁倒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農民的估價（與民粹派對於農民的估價不同的），反而根本證實了這個估價。現在，新改制建立了二十多

年之後，無論這問題狀況如何，但此事實是不可磨滅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寧可說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馬克思主義陣營內沒有一個人會把農民看做社會主義發展底一個因素，列寧更不待說。列寧時常提醒人說：若無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援助，俄國資產階級復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並沒有想錯：史大林底官僚政制，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復辟底第一階段。

以上便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兩大派底不同立場。可是在這兩種立場之外，從第一次革命發生時起，就有第三種立場提出來了。這種立場，那時雖然實際上未曾得到承認，我們仍須加以說明，——不僅因為牠後來被一九一七年事變所證實了，尤其因為革命了七年之後，牠出人意外地，在史大林以及整個蘇維埃官僚層政治發展上開始佔據重要的位置。

一九〇五年初，我在日內瓦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其中分析了一九〇四年冬間俄國政治局勢。我做結論說：自由派請願和宴會運動已經竭其可能性了，急進的智識分子，寄託其希望於自由派的，已經同後者一起走到了斷頭巷；農民運動造就着便於勝利的條件，但是不能確保勝利；惟有無產階級武裝暴動才能獲得勝利；朝着這個方向走去，次一階段必須是總同盟罷工。這本小冊子名爲『一月九日之前』，是在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以前寫的。從那日開始的強大的罷工潮，以及隨之俱來的第一次武裝鬥爭，就是這本小冊子內戰畧診斷之明白的證實。

巴武士替我的小冊子寫了序文。巴武士本是俄國僑民，那時已經成爲有名的德國著作家了。他是個具有非常創造力的人，容易受他人思想影響，也容易以自己思想影響他人。但缺乏內向的均衡和勤

勉，以致不能善用其才幹去做工人運動底思想家和著作家。無疑，他對我個人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尤其在拿社會革命觀點去理解我們的時代方面。我們兩人第一次見面以前幾年，巴武士就熱烈主張德國總同盟罷工了。可是當時德國正在經過長期的繁榮，社會民主黨正在適應於霍亨佐倫政制，外國人底革命宣傳祇能得人嘲笑和冷遇罷了。彼得堡流血之翌日，巴武士讀了我的小冊子原稿，便產生了一種思想，關於落後俄國底無產階級能發揮異乎尋常的作用。我們兩人在慕尼黑同住了幾日，談了許多話，結果兩人增加了不少的理解和私人的交誼。巴武士那時替我的小冊子寫的序文，就永遠進入俄國革命歷史去了。他用寥寥數頁文字投射光明於落後俄國那些社會寺殊性，這些特殊性固然是象人所知曉的，但在他以前沒有一個人會從中做出一切必需的結論。

巴武士寫道：「大家知道，西歐各國政治的急進主義都是首先依存於小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就是手工業者，也就是資產階級中那些部分，他們被工業發展所超越了，又被資本家階級所排擠了。……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俄國，城市發展是多近於中國式的而少近於歐洲式的。俄國城市乃是行政的中心，帶着純粹的官僚的性質，並無政治意義，至於經濟意義，則不過是周圍地主和農民底商業市場。當資本主義過程起來結束這種城市發展時候，城市本身還是很幼稚的。資本主義開始按照自己的形像建立大城市，即是建立工廠城市和世界商業城市。……凡障礙俄國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發展的，反能增進俄國無產階級底階級意識，——這就是俄國手工業的生產形式底幼稚性。俄國無產階級是直接集中在工廠裏面的。……」

「農民羣衆一天多一天被捲入運動之中。但農民所做的事情，就是增加那業已瀰漫全國的政治混

亂，以此更加削弱政府力量；農民不能形成嚴密的革命軍隊。所以，革命若發展下去，政治工作將一天多一天落於無產階級肩上。同時，無產階級底政治警覺性亦將加強起來，無產階級底政治毅力亦將迅速增長。……

「社會民主黨將面臨這一雙岔路口：非負起臨時政府責任，便須退出工人運動。工人將視臨時政府爲自己的政府，不管社會民主黨對牠採取什麼態度。……在俄國，惟有工人能成就革命的暴動。在俄國，革命的臨時政府將是「工人民主」政府。這個政府將是社會民主黨政府，倘若社會民主黨是站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前列的。……」

「社會民主黨臨時政府不能在俄國成就社會主義的革命，但肅清專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個過程本身就要供給臨時政府以豐饒的地基爲政治活動之用。」

一九〇五年秋，正當革命事變蓬勃發展時候，我又會見巴武士，此次是在彼得堡。我們兩人與兩大派都無組織關係；我們共同編輯一個報紙「俄國人底話」，這是給工人羣衆看的報紙；我們又與門雪維克派合辦「發端報」，這是很重要的政治報。「不斷革命論」常常被人聯繫於「巴武士和托洛次基」兩個名字。這祇有一部分是對的。巴武士於上世紀末年，當他向所謂「修正主義」（即曲解馬克思理論的機會主義）進攻時候，已成熟爲革命家了。可是無論他如何努力推動德國社會民主黨向更堅決的政策走去，總不成功，於是他的樂觀受了傷害，他漸漸懷疑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前途。同時，他覺得：「社會民主黨臨時政府不能在俄國成就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他的診斷，並不指示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僅僅指示在俄國建立一個工人民主政制的前途，或多或少同在澳洲一

般，那裏，以農業家爲基礎的第一個工人政府並不敢走出資產階級政制範圍外去。

我並不同意巴武士這個結論。在新大陸處女地上有機生長起來的澳洲民主政制，立即帶着保守性質，而且統治着幼稚而微有特權的無產階級。俄國民主政制，恰恰相反，祇能作爲大規模革命暴動結果而實現的，此暴動底動態不容許工人政府保持在資產階級民主政制框殼之內。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不久，我們二人意見就開始分歧了，到了大戰開始時就達到完全的決裂。懷疑家巴武士已經殺死革命家巴武士了，他那時就站在德國帝國主義方面，他後來又做了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厄柏爾底顧問和智囊。

我寫了「一月九日之前」小冊子以後，就去做建立和發揮不斷革命論的工作。寫這本傳記的人，在他後來的思想發展上，不斷革命論既然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那麼此處應當說一說不斷革命論是什麼。以下便是我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著作之摘錄。

「在當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底核心乃是僱傭勞動階級。這個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一般還沒有存在，如今則要在我們的革命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了。……經濟上較落後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可以比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國家底無產階級，更早些得到政權。有一種思想，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機械地受本國技術力和技術手段所決定的，——這種思想乃是非常簡單化的「經濟的」唯物論之成見，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美國工業生產力雖然比俄國高了一十倍，可是俄國無產階級底政治作用，牠對於本國政治的影響，以及不久之後對於世界政治的影響，則比美國無產階級更大得多了。……」

「我覺得俄國革命將造成那種條件，使得資產階級自由派尙未能完全發揮其統治才幹以前，政權就能夠（若在勝利情形之下，則不僅能夠而且必須）落入無產階級手中了。……俄國資產階級將獻出一切革命陣地給無產階級，因之亦須獻出對於農民的革命領導權給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得到了政權，就要解放農民。……得到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將動員一切力量來提高鄉村文化水平，來發展農民底政治意識。……」

「但農民不會驅逐無產階級而代替其位置麼？不會的。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排除這個可能性。歷史經驗證明：農民是完全不能發揮獨立的政治作用的。根據以上所說，就可以知道我對於「工農專政」觀念的見解。問題並不在於我原則上承認或不承認，要或不要，這種政治合作形式。我認爲，這種合作形式是不能實現的，至少在其直接的意義，下說來，是不能實現的。……」

上面引的幾段話，已可證明後來人們反覆說着：不斷革命論「跳過資產階級革命」一類的話，是如何不正確的了。我同時又會寫道：「爲俄國底民主改革而鬥爭，就其整個說，是出自資本主義的，是資本主義基礎上所形成的力量來領導的，其直接的首先是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路上那些封建的障礙的。」但是問題底本質乃在於用什麼力量，用什麼方法，才能克服那些障礙。「一切革命問題，其框殼可以限制於以下的話中，即說：我們的革命，在其客觀的目的上，因之在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結果上，是資產階級的。但如此，人們會閉眼不看這個事實，即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底主要活動力乃是無產階級，牠靠革命底一切力量推動自己向政權前進。……人們也可以自己安慰說：俄國社會條件尙未成熟社會主義經濟。但如此，人們會忽畧了這個思想，即說無產階級達到政權後，爲其地位必然

邏輯所推動，將靠國家力量去管理經濟。……無產階級代表人，不是以無力的人質資格，而是以領導力量資格進入政府的，僅僅以此資格，他們就要衝破高黨綱和低黨綱之間的界限，即要提出集產主義於議事日程。在此方向上，無產階級將走得多遠，須隨各種力量間相互關係而定，決不隨無產階級黨底初意而定的。……

「但我們已經可以自問道：無產階級專政須衝出資產階級革命框殼以外去麼？或能夠在現存世界歷史局面上，於衝出此框殼以後，存着勝利希望麼？……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說的，即：若無歐洲無產階級政府直接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將不能保持其政權，將不能轉變其暫時的統治為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但這話不一定引到悲觀的診斷去。「俄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政治解放，將抬高領導者至於歷史上空前的高度，將交付領導者以極大的力量和手段，使之倡始世界範圍的肅清資本主義運動，這個運動底一切客觀前提，歷史已準備好了。……」

關於國際社會民主黨能夠履行其革命任務至什麼程度，我在一九〇六年寫道：「歐洲社會黨，首先其中最有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發展了牠們的保守性，羣衆傾向社會主義愈多，其組織和紀律愈有效力，則各黨底保守性也愈加強烈。爲此之故，代表無產階級政治經驗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到了某一時候，將成爲工人向資產階級反動之公開鬥爭路上直接的障礙物。……」但我總結我的分析時，還是表示一種確信，認爲「東方革命將以革命的理想主義影響西方無產階級，激發牠的願望，開始同牠的敵人說『俄國話』。……」

試總結一下。民粹派，同斯拉夫主義一般，從下一幻想出發，即認為俄國底發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蒲列漢諾夫底馬克思主義則集中於證明俄國歷史道路和西方歷史道路原則上並無不同。但由此產生出來的綱領，反而漠視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發展上真實的而非神秘的特殊點。門雪維克派底革命觀，除去其插話性的歧異和個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祇有在自由派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此勝利必然推送自由派資產階級走上政權。以後，民主政制就將使得無產階級，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牠的西方兄弟輩。

列寧底見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經過「工農民主專政」得到的革命完全勝利，將肅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將給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速度，將加強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力量，將使社會主義鬥爭成爲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國革命底勝利亦將大大推動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不僅能保障俄國免除復辟危險，而且能促使俄國無產階級於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奪得政權。

不斷革命論底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國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祇有在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不僅提出民主任務於議事日程，而且提出社會主義任務於議事日程，同時亦將大大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惟有西方無產階級底勝利才能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復辟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

以上的括概的公式同等明白地顯示後二者與自由派門雪維克見解之差異，不可和解的差異，又顯

示後二者之間對於革命產生的專政之社會性質和任務問題也有非常重要的差異。現時，莫斯科諸理論家時常說：無產階級專政綱領，在一九〇五年是「未成熟的」。但這話是越出本問題以外。在一種經驗的意義之下說來，工農民主專政綱領也是經事實證明為「未成熟的」。第一次革命時，勢力對比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正如不利於一般革命勝利。可是那時各派革命者都是寄託希望於完全勝利的；若無此希望，至高的革命鬥爭就是不可能的。意見底分歧，乃是關於革命底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戰畧問題。門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給無產階級指示錯誤的道路。布爾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們很正確指示鬥爭的底總方向，但關於鬥爭底階段說得不正確。布爾雪維克底前途不完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尚未明顯暴露出來，僅僅因為革命本身尚未更進一步發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時，列寧就不得不直接與他的黨底老幹部衝突，而改變布爾雪維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診斷都不能自命為算學一般精密無訛的。祇要牠能正確指示發展底總路向，能幫助實際事變過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過程，沿這路向走去，——就足夠了。在這意義上，我們不能看出不斷革命論底俄國革命觀確會完全通過歷史底考驗。在蘇維埃政制成立最初幾年沒有一人否認這事實，反之無數官式出版物都承認了這事實，可是，當蘇維埃社會變成冷而靜的上層分子中，開始對於十月革命發生官僚主義的反動時候，人們立即就向不斷革命論施行攻擊了，這個理論比別的理论更加完全反映第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也公開暴露此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受限制的和部份的性質。如此，在排斥不斷革命論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國社會主義論」——史大林主義底基本教條。

(註一) 三種俄國革命觀 這是托洛次基所著「史大林傳」之附錄。托洛次基遇難時，「史大林傳」僅僅寫成前七章及此篇附錄，其餘祇有綱要或初稿。出版者請人根據那些材料續寫成此書第八章以下，於珍珠港事件時已經寫成而且印好了。可是美國政府為顧全史大林友誼之故，不許此書出版，延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才解禁。此書發行以後曾轟動全世界，通信社會視為世界大事，發出通信，可是出版者聘請的翻譯兼續寫人，政見與著作人不同，續寫部分不能視為完全代表著作人的思想。至於此篇附錄，則是托洛次基自己所寫，而且校閱過英文譯文的。

(註二) 統一大會 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大會，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日開會於瑞典首都斯托克霍姆。自從第二次大會兩派分裂後，到此又聯合開會，但結果仍未能統一起來。

(註三) 蜂蟻式的國會 即俄國第一屆國會，開會於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九日，共七十三日。立憲民主黨在這屆國會中佔得多數，與政府有爭執，所以開會不久就為皇帝下令解散了。俄國如此反動，連這種國會也不許存在的。

(註四) 喬弗里斯(Tiflis) 喬其亞首城。按史大林是喬其亞人，那時在喬弗里斯活動。

(註五) 紳董會(Zemstvo) 一種半官性的地方自治機關，僅存在於中俄諸省及其他若干地方，其中地主佔據支配的勢力。紳董會有時主張立憲政治，但一般是反動的，不過革命黨常常圖謀利用其中個別紳董或所屬的技術人員做反對帝制的工作。

(註六) **流血的星期日** 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那日彼得格拉羣衆到冬宮來向皇帝請願，但衛隊開槍，殺死了無數的人，一九〇五年革命就是從這日開幕的。

(註七) **熱月運動** 即蘇聯革命後官僚主義的反動。這裏借用法國大革命典故。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革命歷熱月(Thermidor)九日，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革命政權被人推翻，從此開始反動，直至拿破崙稱帝和布爾奔家復辟。

中華民國捌拾叁年壹月廿柒日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223623



十月書店印行

新蒲崗崇齡街八十五號

齡大廈B座十五樓六室

一本港幣三元

3.281

36-2

籍